

99/5
总第86期

炎黄春秋

■ 邓小平重视监督体制法律化

■ 粉碎“四人帮”前的一次军委会

■ 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任务

■ 毛泽东的“打鬼战略”

■ 张爱萍广揽人才建海军

■ 澳门沧桑四百八十年

■ 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1991年邓小平参观上海南浦大桥工地

炎黄春秋

- 2 邓小平重视监督体制的法律化 张赞宁
 7 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任务 苏双碧
 10 粉碎“四人帮”前的一次军委会 张廷发
 15 毛主席的“打鬼战略” 王毅
 20 陈永贵过“关”记 范银怀

- 26 张爱萍广揽人才建海军 陆其明
 32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悲怆的人生 许人俊
 37 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高勇
 42 送别丁一岚 张帆

- 46 杨勇上将当红娘 舒云
 48 美国的家庭服务小时工 官伟勋

- 50 澳门沧桑480年 立之
 57 新官堕落定律 吴思
 54 再识宁波帮 李一鑫 张绪文

- 52 也谈不可淡忘“文革” 李冰封
 75 清官梦 靳树鹏
 60 “五四”断想——胡适阴影 余广人

- 78 中共中央档案历险记 王光远
 62 美国制造的“银河号事件” 陈文如
 76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 何蜀

- 64 马万祺诗中的情怀 吴跃农
 66 于右任秘书谈于老晚年轶事 俞乃蕴

- 70 田家英雁荡论文章 冠西
 72 《北风吹》饮誉世界 曲作者埋名52年 前民

- 74 盐官古镇纪游 包绍华

- 53 “兵部员外郎”不是“兵部的第三把手” 谭玉明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黎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庄 李普
 李学勤 吴象 苏双碧
 张鍈 张国琦 凌云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青 戴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实 宋文茂(常务) 徐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吴思

理事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书长: 徐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照排: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印刷: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 4.80元

邓小平

重视监督体制的法律化

● 张赞宁

建立和完善监督法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走过了一段很大的弯路，到了反右与“文革”时期几乎完全破坏殆尽。一代伟人毛泽东，由于长期从事国内革命战争，从战争的经历中，悟出了靠政策、靠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经验。因此，他从来是注重人治而轻视法治的，他甚至公开讲过，“法治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就是要靠人治，不靠法治。”“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做官要放开手脚做”，这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有时候，即使是经他自己亲手制定出来的法律，也被他自己破坏掉了。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建国以来的29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不少法律

制定了，而且有些是制订得很不错的，结果往往都被法律的制订者自己破坏了。在60年代我国也制定了一些很好的法律。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一部很好的宪法，但是这部宪法却连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合法权益都未能保住。正是鉴于毛泽东晚年的这一错误，邓小平同志严肃批评了“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变”的以人为法、以言代法的人治现象。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和对建国以来29年中的巨大失误的经验总结。

有个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是，在反右斗争中，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部门或者某个基

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就应划为右派分子。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可是，到了9年之后的“文革”时期，也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起草和审定的党的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却说：反对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或一个省的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反对省委，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同样的言行，在1957年要划右派，在1966年却成了革命派。一个国家的法令、政令到了如此随心所欲的地步，何以取信于民？法不将法，国何为国耶？！

但是如何才能保证做到我国的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呢？过去我们曾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两个党的英明领袖身上，认为只要把接班人选好了，我国的法制就有希望。须知这不仅是一种很幼稚，很不切实际的想法，

而且也是有违民主政体本身的。1980年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毛泽东选定林彪和华国锋做接班人一事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过去我们已经为此付出昂贵学费，沉重的代价。如果再走过去的老路，那么，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要有“组织制度”作保障，“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他说：“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

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这里把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尤其是要有一个可供群众监督的法律制度，提到了一个关系到党是否改变颜色、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建立和完善监督法制是实行廉政、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有人认为，腐败现象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副产品，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党内有保守思想的人也将此归咎于改革开放，并以此为理由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特区政策等提出了质疑。不少群众也埋怨中央反腐败措施不力，决心不够，以致腐败猖獗。其实，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国对腐败的打击是相当严厉的，而且处理了一批包括陈希同在内的党内腐败分子，但是总的收效不大。为什么腐败行为总是屡禁不止，而且大有越抓越多之势，使人感到，这里抓了一个腐败分子，但过阵子那里又冒出了十个腐败分子，大

有防不胜防之势。关键就在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督法制，来制约权力的滥用。有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例子是，首钢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因索贿受贿被判处死刑。可是在管志诚被处决后不久，接替管志诚职务的杨立宇、赵东祥两人又照样步了管志诚的后尘，也因贪污受贿罪被带上刑事审判庭接受审判。难道法律对他的前任判处死刑的处罚还不够严厉，还不足以震慑后来者？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各国的经验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绝对的腐败。权力不受制约才是腐败的根源。因此，治理腐败的根本措施，仍在于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可供操作的监督法制。有了监督法制，人民才可能对腐败分子进行及时的弹劾和挽救。因为及时的弹劾和罢免，往往是在问题只有苗头时就可以进行。现在由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往往是在问题成堆时，甚至发展到无可挽救时才去处理。许多判处死刑的贪污犯均有此遗憾。

小平同志在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时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那么，过去的一些不好的

制度是指什么呢？通过学习小平理论，我的体会是，小平所指的“不好的制度”主要是指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体制。领导干部的权力不受制约，没有一个有效的完善的监督体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作风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等。

1998年暑假我们铁道医学院组织了法律系学生向社会作了一次“法制建设状况”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450份，回收率为90%。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最主要保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四个选择答案，其中认为应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和健全监督法制，使干部权力受到制约的有315人，占70%；答要靠中央下决心和靠加强干部自律教育的只有135人，占30%。可见广大群众也看到了反腐败光靠中央下决心和寄希望于干部自律是不够的，而主要还得靠群众的民主监督，尤其要健全监督法制。

调查问卷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下列监督机制中，你认为最重要的监督是哪几个？这个问题共列了6个选择答案：一是党内监督；二是行政监督；三是司法监督；四是舆论监督；五是群众监督；六是各民主党派监督。选择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各民主党派监督的只占24.6%，而选择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与司法监督的占75.4%。可见广大群众已认识到了在反

腐败的斗争中，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远比党内监督和上级行政监督更为有效。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与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

“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已作为我党第十五大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次明确提出来了，这是十五大与历次代表大会的不同之处。

实行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是促进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民主政治与现代化经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民主进程决定着经济建设的进程。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

了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组织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营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在这里，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个民主化的概念，即政治生活民主化、经营管理民主化和整个社会生活都要民主化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这是一个很精辟的论述。新中国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国的民主空气最不正常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走向最低谷的时候。我国的民主进程与经济的发展是呈正比的。我国执政党内的家长制作风与我国经济的增长是呈现反比的。曾记否，在我国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批评反冒进，1959年的反右倾，这一最不民主的时期后，接踵而来的是，我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和连续3年大饥荒！据《中国人口年鉴》资料表明，仅1960年这一年我国人口净增-45.7‰，这一年比上一年减少了1100万人口。按当时正常人口增长率本应净增20‰左右，以当年6亿人口计算，这一年本应净增1200万人口。这样一增一减，实际上仅这一年在我国的人口曲线图上就减少了2300万人。这就意味着，这一年有二千多万人饥饿而死。1961年又

继续比上年减少了384万人，减去新出生的人数，实际上这一年有1600万人死亡，才可能达到比上年减少384万人的数字。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事实啊！

文革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又再次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拨乱反正以后，我国的民主空气有了比较大的好转，于是我国的经济也就有了高速度的全面增长，并为世界瞩目。这是铁的事实，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

实行民主政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监督法制的组织保证

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监督法制，不能靠某个开明君主或具有民主意识的革命领袖的一次讲话，一个批示，或者由党中央下达一个红头文件，就能完成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毛泽东同志有许多讲话都强调了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体制上和制度上的保障，结果他自己晚期就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所以要使监督法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作保证。没有民主政体作组织上的保证，社会主义监督法制是决不可能建立并存在下去的，即使建立了，也决不可能长久。

1998年暑假铁道医学院法

律系学生向社会所作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卷题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法可依的问题尚未解决故应加强立法，”还是“有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结果答后者的占80.4%。可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在我国并非是个别现象。为什么法律制定了，而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履行？根本问题就在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督法制。对于失职者，执法违法者，徇私枉法者，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供操作的，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来对他们进行制约。对这些人我们还难以用法律手段，使其受到法律的制裁。

去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民主政治作保证，权力集中在慈禧太后一个人的手里。过去的一些史书，在讲到慈禧太后时，都说他极端仇视改良派人士，反对维新变法。但这只是一个现象。其实，慈禧太后反对维新变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她感到了维新变法的引进会使自己失去权力。据史料记载，在光绪皇帝开始实行维新变法时，慈禧太后并未表示反对。作为一国的实际君主（光绪皇帝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君主），她也希望国富民强；但她更看重的是自己个人的权力。如果戊戌变法既能使国家强盛，又不削弱、甚至还可以加强她个人的权力，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戊戌变法之所以尚能持

续103天的原因。如果慈禧一开始就反对变法，那戊戌变法肯定是一天也不能进行的。在这103天中，慈禧始终在观察，维新变法对自己的权力有什么影响，如果不会削弱并能加强自己的权力，那么，就让你们搞去吧；要是变法将会削弱自己的权力，那是万万不能让你搞下去的。戊戌变法的宗旨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建立议院制，实行三权分立。这无疑使她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威胁。当她明确地看出了这一点后，于是才以“祖宗的宗法不能改”为由，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镇压维新派人士。实际上，在维新变法之前，慈禧自己就搞过一些改革和维新，如支持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开办洋学堂等。可见，慈禧太后他所仇视和反对的并非是维新变法本身，而是维新变法将会使她失去独裁统治的权力和地位。

小平同志指出：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必须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没有制度作保证，要肃清封建残余也将是一句空话。这些制度，除公务员制度，退休制度外还包括一切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人人平等及废除终身制，规定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的任职期限，每届不能超过3-5年，连选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等。这些都是很有效的一种反封建的措施。如不实行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回到封建制度的老路上去，就会蜕变成只是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提出：“关键是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两次提到了要建立弹劾制度，可见弹劾制度在监督法制中的重要地位。可是我国的弹劾制度至今还没有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还严厉批评了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家长制作风。他说：“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就是把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由此而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灾难性的。邓

小平还着重提到：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形成，也同党内的家长制作风有关。并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它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外，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可是，18年过去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得到好的贯彻。不少中央领导下到各省市视察工作时仍然有封锁交通的情况。只要中央首长一来，他所要经过的交通全要封锁起来，让所有的平民百姓给他一个人让道。这实际上搞的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而且今天的做法比起过去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讲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则往事。1921年孙中山从广州乘船去福州，都督孙道仁打出了“孙大总统万岁！”的标语，迎接他。孙中山见后非常生气，令其去掉标语后才肯登岸。他对孙道仁说：“大总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可以选他也可以罢免他，我们为了打倒‘万岁’，许多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如今我又来接受万岁的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在天之灵！”可是在36年之

后的1957年，竟有人因为说了句“我认为喊毛主席万岁是唯心主义的”，就被打成了右派。现在，我们见了党政领导，仍然要喊××书记、××长，似乎只有这样称呼，喊的人才觉得自在，听的人才觉得舒服。就像儿子喊老子，非得喊爸爸那样自然。其实，这也是民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是邓小平曾批评过的“把上下级之间搞成了猫鼠关系。”人民群众同党政干部之间没有一个平等的政治地位与法律地位，那末，又何以能实施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呢？这说明我们在推翻封建统治已经7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头脑中的民主意识，有的还仍然停留在当年孙道仁的水平上。

最后谨用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

（责任编辑：致 中）

（作者张赞宁系南京铁道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更正

本刊第二期《一本书 半个世》一文中（第53页），由于校对的疏忽，将当时北京军区宣传部长续桂峰，误为续桂军。谨向续桂峰同志和读者致歉。

批判封建主义 是跨世纪任务

● 苏双碧

就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风雷激荡的世纪，是飞速变化的世纪。历史走进本世纪时，中国还是封建王朝的统治。如果从秦汉算起，这种封建王朝的统治形式已经延伸了 2000 多年，任凭陈胜、吴广，任凭李自成、洪秀全们怎样冲击，封建王朝的统治仍旧牢固地存在着。但是，反封建的旗帜既然为维新人士举起，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也必然会有继起的后来人。当历史进入本世纪的第 11 个年头，辛亥革命的炮声就把清封建王朝轰垮了。不管人们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成败，持续 2000 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毕竟结束了。在这之后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张勋，谁想恢复封建王朝的统治，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辛亥革命毕竟使新的社会形态替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历史仅又过了 6 年，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把中国进一步推上了多极政治争斗的局势，历史在斗争中激变，历史在斗争中前进。不到 30 年的时间，激变中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战胜了国民党政府。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又替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特别是本世纪的 70 年代末，当人们从“文革”的惨痛教训中猛醒过来时，几乎没有作过多的思索和选择，便纷纷站在由邓小平举起的改革开放的旗帜下，中国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 年的时间所创造的财富，是过去任何辉煌的时代也无法比拟的。本世纪值得欣慰值得回顾的事很多，然而在本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也很多。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封建主义的影响。虽经仁人志士不遗余力地反对过一个多世纪，封建主义却仍

然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时刻在阻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中国的封建主义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因而它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显得更为牢固。封建主义受到冲击，始于上个世纪中叶的西学东渐。尽管当时改革派不过是提出“师夷长技”，学点船坚炮利；提出开办同文馆，学点外国语和天文历算；提倡富国强兵，学办近代工业；后来也有胆子大点的，提出君主立宪，提出改变祖宗之法。但是，封建顽固派，几乎在历史每进一步的时候，都要激烈地反对，其武器要么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要么是西学的传播“有伤王化”，要么是抬出封建纲纪，或者提倡复兴国学、发扬国粹。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胡适到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胡耀邦等等，都身体力行，极力主张批判封建主义。而封建卫道者，几乎是以不变应万变，用来反击或批判的武器，仍然是上个世纪抵制西学东渐的那些祖宗之法、封建纲纪或提倡“国粹”，这些武器不用更新，原封不动就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大军起来反对批判封建主义，或者重新宣扬封建主义。他们步步为营，阻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向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发展。

正因为封建主义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也只有借助孔子之亡灵，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尚孔孟，以端其基，以致其用”，提倡尊孔读经，继续用孔孟之道来荼毒生民。“五·四”运动提倡科

学与民主，喊出了震撼国民心灵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都是对着封建主义思想、封建迷信和封建道德，是对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意识形态的讨伐。严格说来，也就是自“五·四”运动起，中国广大下层社会的思想才受到一次触动，才意识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仁义道德为表，以“吃人”社会为里的，那些麻木不仁的吃人血馒头的人才有可能醒悟起来，而阿 Q 也才会有小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的思想，尽管迂腐，但毕竟和过去有点不同了。

对“五·四”运动产生的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几十年来，人们却似乎很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一叫做“全盘西化”，这在“五·四”运动中明确主张的并不多，公开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和陈序经，是在 1926 年之后，到 30 年代初，持这种主张的仍然以他们两人为代表。因为所谓“全盘西化”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生活习俗，传统的风气，这些东西怎么能都西化？这个概念就连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事实上，不论胡适还是陈序经，他们研究的仍然是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推开。它之所以遭到反复批判，是因为他们以一个极端来反对另一个极端。由于这个论调有明显的错误，伤及正统的中国人的自尊心，谁都可以不太费力气地批它几句。至于“全盘西化”究竟有多少影响和危害却很少有人去认真地研究过。其二是国粹思潮，即封建的卫道思潮。他们视“五·四”新文化思潮如洪水猛兽，声嘶力竭地反对科学和民主，而对刺痛其筋骨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创办《国故月刊》，组织“亚洲古学会”，攻击新思潮是“人间之怪物”，是“背天反常禽兽”，叫嚷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但是，“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社会舆论，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新闻界都纷纷抨击封建卫道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诸君”。鲁迅在《随感录》中也辛辣地指出，所谓保护“国粹”，是保护生在中国人肢体上的“无名肿毒”，而这种“肿毒”实际上是“祖宗老病”，是封建糟粕，并不吃香。他们只是凭着旧文化的深厚土壤拼命阻止新思潮的发展，希望中国能如他们所愿退回到

封建专制的时代去。但是，“国粹”派的卫道者们，尽管是“拼了老命”了，还是遏制不住新思想的发展，反而把自己弄得声名狼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彻底失败了。“五·四”过后不久，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历史进程遭到暂时挫折之机，辜鸿铭等便又重新举起国粹的旗号，叫嚷要“复兴东方文明”，即复兴孔孟之道。其时，人们对“五·四”的科学、民主赞誉之声犹在，这个反“五·四”精神的复古逆流，自然受到社会广泛的冷淡和抵制。但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又深又厚，有着相当大的历史承袭性，只要稍微有点土壤和气候，便可以变换面孔，重新复活。继辜鸿铭等的吵嚷之后，一些国民党的政要，如戴季陶辈就认为中国能立国于世界，“焕然文明者，厥为礼教”，“礼乐之制，为建国要务。”在“五·四”运动之后，戴季陶一类的国民党右翼，包括军阀势力，以及蒋介石等等，他们的政治、思想、文化主张，大多借用传统文化中的精辟词句，如忠、孝、仁、义、信、礼等等。这些熟悉的词句，隐含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堕性，可以起到遮住人们的视线，混淆是非界限，从而也起到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国粹派或者叫做尊孔读经派，在近代中国反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和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改造，以及在城市的市政建制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等等活动，对封建主义的打击是空前的也是沉重的。但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滞留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和权力掺杂在一起时，它的消极作用便尤其突出。封建专制主义在封建社会的统治特点，是以皇权为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其表现形式是朕即国家，朕即社稷。皇帝讲话金口玉律，只要是皇帝说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上下臣民一概要服从。维护这种独尊信念的是对皇权的愚忠。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本应来自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专制和忠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如果沾上封建主义思想，皇权在他们身上同样会有突出的表现。十年浩劫初期，毛泽东想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赞成的人并不多。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把吴晗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时，当江青、张春桥等人以上海为基地，以《文汇报》为喉舌，步步上纲，步步扩大，矛头直指整个上层建筑以及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时，全党和整个党中央赞成发动这场大革命的仍然不多。站在姚文元一边的也只有张春桥、江青，以及当时在北京的康生几个人。而在党中央所在地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一大批中央政要，并没有同意，甚至在行动上对姚文元诬陷吴晗，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是有所抵制的，要说力量对比，反对派远远超过张春桥、江青等人。但是，关键在毛泽东，他站在少数一边，少数派便立刻变成多数派。人们都还记得，在“文革”中，十多位副总理级的领导人在怀仁堂研究工作时，对当时形势发了几句牢骚，立即被扣上“二月逆流”，统统被列入批斗的对象。在这里，是非的标准是权力，而不是真理。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人们走出现代迷信，开始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现实生活仍然产生着重大的消极和破坏作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又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会出现家长制作风，出现个人高度集权，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因此邓小平提出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这样才能“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这样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邓小平的号召下，曾经发表过一些批判封建主义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批判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同时，也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一有气候、

土壤，便会重新萌发起来。近几年来封建主义重新变换面孔，卷土重来，继续阻止历史的进程。比如，他们打着鼓吹传统文化的旗号，把一些原是封建糟粕的东西，当成“国粹”加以宣扬，如二十四孝图、三纲五常、老皇历等到处传播和销售；而思想领域，有些人则宣传旧道德、旧礼教，传播封建迷信；有的人则提倡什么新儒学，说什么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等等复古思潮，旗帜鲜明，不一而足，不但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拉回到封建主义去，还想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成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即将告别20世纪。回首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封建主义就像一条又粗又黑的线，时刻在纠缠着历史的脚步，阻拦着历史的进程。正如邓小平在上引文章中所说的，由于我们对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下大功夫去消除它的影响。这是在思想领域里留给下一世纪的一个巨大的消极因素。当然，历史是不可能如一些人所愿会回到孔孟时代的，但是，封建残余势力对历史的反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讲述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哪怕只有最简单的一句“最高指示”，都会把千百万人召唤到大街上去游行、喊口号，都感到不可思议，但它却是事实。谁能保证，当人民赋予人民公仆的权力掺进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时，朕即国家的思想不会再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不会再发生，家长制的作风不会再抬头？历史当然不会以原样重复，但历史由于封建主义的阻挡，进程会变得迟缓、停滞，甚至倒退，这却是可能出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号召，十分重要。在邓小平的理论宝库中，当然也包括批判封建主义这一历史命题。只有认真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坚决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对各个领域的侵蚀和破坏，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也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阔步前进。

（苏双碧：现任《求是》杂志编审）
（责任编辑 映雪）

粉碎『四人帮』前的一次军委会

● 张廷发



1975年6月7日，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议。这次会议，在党、国家、军队的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将永载党、国家、军队的史册。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历史背景

林彪反党集团自我毁灭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亲自为叶剑英的错案平反。1972年1月，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所作的悼词，肯定了陈毅同志的一生功绩。紧接着，周恩来积极安排一大批老干部、专家、学

者、教授、文艺界知名人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73年3月10日，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8月，党的十大召开，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毛主席提出要为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一系列行动，为全国各方面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上旬，党的

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同总参谋部团以上干部见面。他开门见山，十分明确坚定地提出整顿军队的问题。他说：“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提高党性，消除派性；要落实政策”。从此以后，他以坚强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同积重难返的诸多弊端作斗争，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义无反顾，顶风逆浪的勇气，这种不怕再一次被打倒的大无畏精神，充分展示了他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

“四人帮”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和一系列部署，极为不满，到处造谣污蔑。邓小平在总参谋部讲军队要整顿以后，“四人帮”借传达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奢谈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把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项行之有效的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横加指责，借以打击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蛊惑人心地提出要打“土围子”，把抵制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老干部、老党员比作延安时期的敌人，胡说老干部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民主

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把矛头指向刚刚解放出来主持工作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妄图再一次把他们打倒。

毛主席对江青等人胡批“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的做法予以纠正。邓小平在各条战线上全面整顿得以进行。3月，他在主管工业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整顿；5月，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整顿；7月，在中央读书班第4期学员座谈会上也讲整顿。坚定、明确地提出要全面整顿的思想，强调无论工业、商业、农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通过整顿，要建立一个“敢”字当头的坚强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落实政策，老中青干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老工人、科技、文艺政策都要落实。

由于“文化大革命”搞了九年，人心思定，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渴望安定团结。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力协助邓小平，在各项工作中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这不能不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策，不能不发展成为在事实上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错误政策的纠正。经过整顿，1975年各条战线发生了明显良好的变化，工业上去了，铁路畅通了，学校上课了，农业正常了，各地派性少了，干部政策开始落实了，有力地证明“批林批孔”、批“经验

主义”，打“土围子”是错误的，也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整顿军队，自上而下地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奠定了基础。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历史功绩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1975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和会议文件，事前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主要精神是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他提出要整掉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在步骤上他提议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说：“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指出：“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邓小平还说：“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改的人。”

叶剑英就肃清林彪反革命

集团的流毒影响，恢复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他强调军队要高度集中，决不允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提高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尽快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安排老干部的工作，被迫害致死的要昭雪；要自上而下地调整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提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我亲身感受到这次会议的针对性很强，很有现实意义。会议分析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我军现状，深入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讨论了军队整顿的措施。会议期间，邓小平还提出要“抓编制、抓装备、抓训练”，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我党、我国、我军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提出了军队整顿的方针、原则和措施，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是解决军队问题的好办法，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和预见性，是我党我军的英明决策。邓小平的讲话，继承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和今后我军质量建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7月1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

及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这次会议传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已初见成效。全军各项工作一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的弊病，军队建设呈现无限生机，对推动军队工作，顶住“四人帮”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紧接着错误地进行了“批邓”“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次会议的积极成果不能落实。

尽管1975年冬至1976年秋，“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造成再一次停产停学，堵塞交通，生产下降，但是，军队是稳定的。人民解放军掌握在听党的话，听中央军委指挥的人手里。邓小平、叶剑英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坚强柱石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那次会议后，邓小平、叶剑英采取果断措施，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迅速调整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23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军队稳定了，把握了那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权。

“四人帮”以不可告人的目的插手空军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毛主席病危不久逝世。邓小平被错误地停

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四面出击，加紧篡夺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深知，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于是把手伸向军队，妄图打开缺口，以便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也把手伸向空军，在1975年秋至1976年秋这一关键时期，他们对空军党委常委实行拉拢、分化、打击等各种卑劣手段，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人，篡夺空军的领导权。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空军党委于7月31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有个前后18天的问题。前18天没有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军队的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军队的各级领导班子，整掉“肿、散、骄、奢、惰”和“软、懒、散”以及叶剑英提出的四条，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的指示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急于讨论编制，算人头帐，会议走偏了方向。

邓小平及时察觉空军常委扩大会议方向有偏，指派陈锡联、苏振华、杨成武、梁必业同志到会，帮助空军常委扩大会议走向正确的轨道。在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帮助下，后18天以邓小平、叶剑英重要讲话为武器，解决了空军党委的思想路线问题。会后，经毛主席批准调整了空军领导班子，先是任命

余立金同志为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0月1日任命我为空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小平同志着重强调说：“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不久，我又见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归纳两位副主席的谈话，一句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副千斤重担。我听了两位领导人这样简单明确，严肃郑重的交待，深深感到形势严重，责任重大。

邓小平、叶剑英领导全国、全军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极大地触及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对邓小平、叶剑英卓有成效的工作恶意诽谤，向毛主席作了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他们迫不及待地抡起大棒打击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军各大单位。在空军，他们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

第一件是，制造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议是“右倾翻案的会”，说“余立金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言论”等等。

当时，民航归空军管。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有什么错？民

航的会是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和全套文件，业经毛主席批准转发全党、全国、全军，明摆着是没有错误的事。王洪文利令智昏，给民航余立金同志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等等大帽子。王洪文点名要同我“谈话”，我没去。他要空军党委常委去了的同志捎话给我说：一要传达他的讲话，二要我们按他定的调子“讨论”民航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写报告给他。对这件事，我们没有照王洪文的“指示”办，一不传达，二不讨论写报告。我们掂量过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如果照他的“指示”办，民航一批高级干部也要被打。即使打倒了余立金和民航一批高级干部，这事也不会了结，王洪文还会抓住这件事不放，时不时会拿出来打我们。所以，我们空军党委常委大多数同志为这件事承担了政治风险。

第二件是，“打招呼会”、“转弯子”问题。1976年2月25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市、军队大单位领导人的“打招呼会”，要与会人员“转弯子”。跟她走，“批邓”、“批右倾翻案风”。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第一书记不作检讨”，给我们施加压力。会上发给空军另一领导人两本极其恶毒，造谣惑众的“大字报选”，要我们传达，翻印下发。我们常委反复商量，还有人三番五次找我，质问为什么不传达，不翻印下

发部队？我们回答说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呀。以此为理由，一不向下传达江青的胡言乱语，二不翻印下发两本反党乱军、祸国殃民的“大字报选”。这件事，在“四人帮”那里是挂了号的，是被“四人帮”定了“罪”要找我算帐的。

第三件是，王洪文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杜忠是空军驻上海的一个副师长，1968年被派往上海公检法军管。他在工作期间，接触到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秘密收集毛主席、周总理的材料。张春桥为掩人耳目，堵住杜忠的嘴，把知情人杜忠抓了起来。杜忠不服，连写四封揭发信向中央报告。在张春桥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杜忠的揭发信全落在“四人帮”手上。

杜忠在长期被关押期间，仍然不服，又写揭发信，从空军的组织系统把信转送中央。信由在南京空军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的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带回北京。我们对此信的处理，十分谨慎，又完全合乎组织原则。规定此信由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和带回此信的副政委黄立清三人保管。其他领导人不接触，以免扩散。作为政委、第一书记的我带头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知道这事非同寻常。它的内容，一头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头涉及张春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

有人向王洪文诬告空军

“扩散”了信的内容。王洪文不顾事实，极其蛮横武断地一口咬定我看了信，“扩散”了信的内容，并给空军党委常委戴上“分裂党中央”的吓人罪名，说“这件事是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均为两地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事件（指1975年）性质一样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真没有看过那封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也就无所畏惧了。王洪文指名要找我谈话，头两次我借故没去。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空军救灾任务很重，每天几百架飞机进出唐山军用机场，我们在忙这件事。第三次点名非要我去不可，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我到三座门去，王洪文没说几句，气焰十分嚣张，就起身走到我面前，扬起几张纸，好像是什么揭发材料之类的东西，在我面前幌起来。“你看过没有？”连问两遍，我不说话。第三次问我，我大声吼叫，同王洪文吵了起来。这次谈话，王洪文一无所获。

我是准备再一次被打倒的。但是，我还是要讲究一点策略，不能让野心家借口把我打倒。打倒了，就失去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阵地，不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交给的“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的任务。

第四件是，南京空军有人揭发黄立清在南京空军党委扩

大会上关于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讲话“有问题”。王洪文看了揭发信后，在信上划了57道红杠，王洪文“批示”说，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洪文武断地“指示”，说黄立清副政委的讲话是我授意的，“第一书记不点头，他能讲出来吗？”他毫不掩饰他们一伙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从这封信入手，砸开空军领导班子！”王洪文还“指示”要我们按他的调子讨论，写报告，并报军委。我们还是不讨论，不写报告。因为黄立清的讲话没有错，他是按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讲的。

第五件是，“四人帮”要抓空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深入，空军内部有人向“四人帮”告状，污蔑空军领导人某人是“最阴险的”，某人是“最明显的”，某人是“最危险的”，实质上这“三种人”是同“四人帮”斗争最坚定的空军领导干部。

这时，毛主席病危，邓小平已经被错误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加紧抢班夺权阴谋活动，王洪文一面派人到空军部队搞“调查”收集“材料”，鼓励这个人“不要怕”，“不要怕被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一面策划组建空军的新班子，王洪文多次公开讲“解决空军领导班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王洪文逼着空军党委表态，要我们说清楚他认为可

以打倒空军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一是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怎么看？二是对“杜忠事件”怎么看？是不是同“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一样的“反革命事件”？三是对中央12号文件怎么执行的？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要“批邓”、“批右倾翻案风”，要清查“天安门事件”，“下放的领导干部要请回来”，“第一书记要作检讨”等等。四是“第一书记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四人帮”步步紧逼，那时我们处境很艰难，但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在1976年同“四人帮”斗争最关键的时候，叶帅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向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立即出院，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以加强对部队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为名，掌握部队动向。在那些日子里，时刻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不几天，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陈锡联同志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我听后，兴奋得晕倒在地，从内心感到党伟大，人民伟大，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最终是自取灭亡而告终！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同志真正解放了。

（责任编辑 致中）

毛泽东的“打鬼战略”

● 王 毅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其全面、公开爆发是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为标志的，而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法西斯”之外，恐怕再也没有别的字眼比上面短短的几个字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了，因为它们的每一笔一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都是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惨遭屠戮和横加在亿万国人头上无尽的苦难。在经历了那样巨大的牺牲之后，谁能说我们不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这几个字的渊源呢？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鬼是过去的阴影，鬼怪必定将我们引回到这样的问题：在那鬼怪还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者时，它曾经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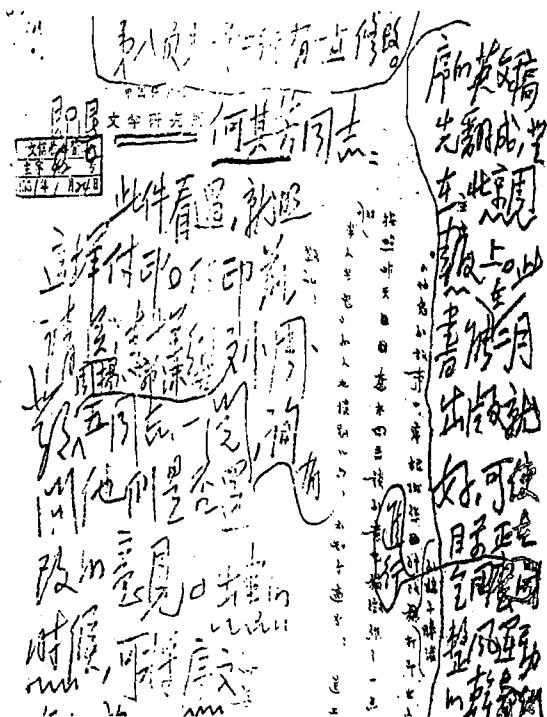
我们说：“横扫牛鬼蛇神”决不仅仅是对“文革”内涵的简单形容和文学化的比喻，而且更是一种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文化战略。本文中将要叙述的自50年代末开始，直到“文革”时瓜熟蒂落，由毛泽东亲自制定，反复申明的“打鬼战略”，就可以对此给予确凿无疑的证明。

一般说来，人类文明既然是从原始时代演化而来的，那么后世就或多或少总要遗留有那个遥远时代的观念及其文化现象。因此现代社会的人们仍然袭用某些有关鬼怪妖孽的语言风俗、文艺素材等等，本是最平常的事。然而也正因为人们进入了现代社会，所以这种袭用总是被限制在十

分有限的范围之内（例如有关神话题材的文艺作品），而决不会笼盖整个社会文化形态。因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总体面貌即如马克思·韦伯所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然而与现代文明这种“祛除巫魅”的进步趋向完全相反，自50年代末开始，“牛鬼蛇神”的阴影逐渐笼罩了整个中国大陆。

在现代中国，“牛鬼蛇神”原来主要是指一些流传很广的传统小说、戏剧的内容，而其演变成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并且关系整个社会文化走向的概念，则是从5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中开始的。例如在1957年3月8日《和文艺界的谈话》中，毛泽东与文艺界的负责人和著名演员反复谈了“鬼戏”的问题，他说：我不赞成牛鬼蛇神，让他演出来批评一下；……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希（稀）奇。……社会上牛鬼蛇神很多啦！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毛泽东在谈鬼戏的时候，已经一再指出社会上有牛鬼蛇神，而且很多。4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一方面重申了可以有一点牛鬼蛇神戏的观点，同时再次郑重提出批判错误思



毛泽东就刊印《不怕鬼的故事·序》在何其芳呈件上的批语

想、毒草和牛鬼蛇神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被《五一六通知》奉为“文革”指南的那段著名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数月之后，对“大鸣大放”的鼓励急剧转变为残酷的“反右斗争”，而这转变的背景之中，就包含了毛泽东对“牛鬼蛇神”的判断有了重大的发展，所以在他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著名的“反右”纲领性文献中，他用了“呼风唤雨，推滔作浪”，“黑云乱翻”等等人们通常用来形容魔鬼的语汇，用以指斥“资产阶级反动右派”之恶毒。接着，他又直接用最严厉的口吻把他们宣判为十恶不赦的恶鬼，并号召民众“歼灭这些丑类”：

本报及一切党报……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们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牛鬼蛇神只有让他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在这个号令下，人们对“右派”的批判讨伐，很大程度上成了把他们判定为极其凶恶诡诈的野兽和魔鬼的指证，仅以当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些大批判文章的题目为例：

- 《章伯钧——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
- 《斩断章伯钧戏剧界的魔爪》
-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
-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 《江苏搜出了一个狼窝》
- 《真理的烈火要烧毁牛鬼蛇神》
- 《……福建民盟又又着了这条凶恶的毒蛇》
- 《扫清工程技术界的牛鬼蛇神》
- 《一条毒蛇——右派分子仁俊卿》

与此相辅而行的，还有报刊上流行用绘画将“右派”描绘成各种丑恶凶残的魔鬼和野兽。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讨伐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批评的范围，而是一种充满“魅鬼气息、近于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对异端、异教的审判和诅咒了”（详见拙文：《“大批判”与诅咒巫术》，《香港社会科学研究所》1996年春季号）。

根据陈晋《在“不怕鬼”的背后——毛泽东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前前后后》（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67—74页）的记述我们可以知道，1959年4月15日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指出：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一是台湾问题，一是西藏问题。为了应对由此产生的国际局面，毛泽东强调：“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说到这里，毛泽东引用了中国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则故事，并总结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知道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是毛泽东在重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把境外的敌人称之为鬼。接着，在同年5月6日接见十一个国家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毛泽东用更明确的语言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4天后的5月10日，毛

泽东在会见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团时又说：“马列主义教我们不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清朝皇帝等鬼。……纽约、伦敦都有。”

毛泽东这些讲话有几点重要的意思：1、资本主义是鬼；2、自己的一切敌人都是鬼；3、鬼遍布于世界的各个角落；4、他自认为“不怕鬼”是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把境外的敌人视之为鬼，而且把境内过去的敌人也视之为鬼。

大约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实施《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编撰工作：他指示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专门落实这项任务。此事即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至1959年夏天，书已基本编成，其内容是从中国历代小说中选出的各种叙述人们如何不怕鬼、并且能够驱鬼除妖的故事。何其芳随即把此书初稿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曾节选出其中一部分，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全会上印发给与会者。

不久，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爆发，《不怕鬼的故事》的定稿工作因此而一度终中断；但是同时，这一间歇也使毛泽东能够结合“庐山会议”以后的形势，将其“打鬼战略”中增添进了最为关键的内容。

1960年，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将《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再加精选、充实，并详加注释（因为原文是比较古奥的文言）。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亲自撰写序言，以说明编选、出版此书的深意。毛泽东指示何其芳先起草一篇，再呈他审阅。于是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万字的序言，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961年1月4日召见何其芳，谈了打鬼“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并特别嘱咐何其芳将他的这个意思补写进序言。谈话结束前，毛泽东又告诉何其芳：他最近写了几首批判修正主义的诗。这几首诗后来何其芳读到了，其中之一有这样几句：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毛泽东此诗中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自己是被“千重”、“万种”的凶神恶鬼包围着；第二，与1957年将“右派”视为“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以及1959年初主要将境外的敌人和西方国家视为鬼魅相比，此时毛泽东眼中的魔鬼不仅完整地包含了国内与境外这两部分敌人，而且已经将他们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何其芳回去以后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后的《序言》呈送毛泽东，并附信说明自己增写的部分“缺乏警策之处，……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毛泽东收到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8日会议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了这本书，并说：“我也六十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审读了《序言》的修改稿之后，又亲自执笔在其结尾处增写了一大段纲领性的文字：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



在反“右”时，画家笔下的章乃器先生，标题是《死的捉住活的》

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更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次中央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拥护莫斯科会议的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订了今后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警世骇俗了。

很显然，毛泽东是把“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这一对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作为战略性的纲领提出来的，他在这里胸有成竹地宣布的“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则空前明确地预示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鬼运动”即将到来。

1月23日，毛泽东再次召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随即把上面一段念给何及在座的人听，然后又将手稿给大家传看。之后，毛泽东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具体指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嘱咐他把稿子誊清后再呈他看。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序言》改好，在1月24日早晨让人呈送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您的稿子修改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按照昨天（胡）乔木同志（王注：胡乔木当时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意见稍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审阅。”值得注意的是：何其芳这里所说的文字上的变动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恰巧供职于何其芳曾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所以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这份手稿，将手稿与后来正式出版时署名何其芳撰写的《序》相比较，毛泽东强调的“需要打鬼”、“打鬼的战略战术都已较前更为明白清楚”两句被删去了，这可能是因为胡乔木等人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用如此直露而严厉的语言披露出“打鬼的战略”还不太适宜，而且与《序》的署名作者何其芳的身份地位不相吻合。但是，今天的读者不难看出：正是这些严峻的话语，才最真实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就审完了这份稿子，并立即交付何其芳。他在何的来信旁边复信：

何其芳同志：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再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一望可知，毛泽东是把《不怕鬼的故事》、特别是经他多次口授、亲自反复修改的该书《序》，作为自己的战略纲领而郑重地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发布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打鬼战略”的内容，除了上面抄录的他亲笔加入的文字之外，我们不妨再抄录这篇《序》中的一段：

……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及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它们或者穷凶极恶，面目狰狞，或者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其变化多端和诡异的程度，可以使过去的故事里的鬼相形见绌。……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完全

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反动的一面也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显而易见，这里不仅把众多国际的政治力量和国内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等统视为魔鬼，而且更进一步强调了魔鬼们“穷凶极恶、面目狰狞”、“形容妖冶、狐媚惑人”等等十恶不赦的禀赋和无穷诡诈的伎俩。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法庭以“魔鬼帮凶”的罪名将几十万无辜者推上火刑场的历史，依然会使几百年后的今人触目惊心的话，那么，每一个还记得自己千百万同胞是怎样背着“牛鬼蛇神”的罪名和永世的屈辱被“横扫”进坟墓的中国人，在仅仅隔了三十年而重读当初这份“打鬼战略”时，难道不会毛骨悚然吗？

《不怕鬼的故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于1961年2月正式出版。因为这本表面上貌不惊人、小册子实际上是一部战略性的著作，所以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它。例如在1962年1月14日会见某国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在重复了此书《序》中的一些观点之后，问客人是否读过此书的英文版或法文版，并表示要将此译本送给他们。又说：“那里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某某是半人半鬼，某某是个鬼，别的鬼还没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怕鬼的故事》出版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心目中魔鬼的范围再一次扩大了。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郑重向中共领导人灌输了他的“打鬼战略”。例如在1961年11月和12月，他两次批示将自己的《读报诗》（即前引“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等等）“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印发各同志”。而几个月之后的1962年9月，毛泽东即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又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文字，以无比明晰的语言说明了“阶级斗争”与“打鬼战略”之间的关系：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在全国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亦即“文革”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预演），又反复阐明了“阶级斗争”与“牛鬼蛇神”的关系，例如他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1963年5月）中说：“这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是什么？要点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随后又说：“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搞阶级斗争了。……‘四清’能搞出很多贪污盗窃、牛鬼蛇神，公安机关搞不出来的，‘四清’能搞出来。”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些指示中提出的撇开常规国家机器，而用“运动”的方式清除他满眼看到的“牛鬼蛇神”，这已经十分接近“文革”的主旨了。所以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就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少年的毒”。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横扫牛鬼蛇神”就成为亿万人民必须投身其中的最神圣事业，例如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中的号召：“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

总之，作为“文革”的纲领，“横扫牛鬼蛇神”的产生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牛鬼蛇神”的外延不断扩大并且日益清晰，而且所有这些敌人的政治定义、文化定义和人格定义，更被日益确凿地赋予魔鬼身上的一切品性。因此，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而又极为严肃的准备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全面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

（责任编辑 致 中）

陈永贵过“关”记

● 范银怀

政治领导人历史应该有透明度，让广大群众都知道。但在“对毛主席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年代里，只要传出伟大领袖一个声音，就能改变事实真相，平息一场争论，决定人的政治命运。

老贫农赵怀礼 讲大寨村史

1964年春夏间，毛泽东虽然还未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但在党内领导层已经听到毛泽东“农业要靠大寨精神”的讲话，因此新华社总社国内部农村组和山西分社领导，就派我到大寨蹲点采访。

来大寨不久，就和一位名叫赵怀礼的贫农相识。他是陈永贵儿媳花妮的伯父。当时大寨还没有招待所，外来客人都挤在几间平房里，为找个安静地方写稿，我就住到他家里。

赵怀礼对来人谈话也无顾忌。平时，他不上地劳动，也不参加队里活动，也不会迎合干部。闲下就躺在铺着毛毡的炕头上聊起天来。我是从他口中才知道1945年昔阳刚解放的历史。

听了赵怀礼对大寨和陈永贵历史的讲述，联想到陈在《党员登记表》填的参加过“兴亚会”，知道他的经历很不一般。

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竟由此引发出一连串政治事件。

刘格平把张怀英证明 信转给“中央文革”

1968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阳泉市副食品公司炊事员李观海（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李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时交代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并担任情报员。该情报组中还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王写的材料，也承认自己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内中还有“领导人是陈永贵”的字样。

当时六十九军在阳泉市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将此情况向党委作了汇报，军党委派人审查了同案人的口供，查阅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锄奸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单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

永贵的名字，并注明是伪村长，情报员身份。日本关押时的审讯材料，上面写的是“归顺释放”。陈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城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支左部队负责人说，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凡是在国民党、日本统治时期被捕过的都是重点审查对象，而且一开始都是当敌我矛盾，交给造反派审查、批斗，从刘少奇到基层的当权派，都逃不过此关。

这是关系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问题，与他一起“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因为他们的政治命运和陈永贵联系在一起。

“文革”初期，和陈永贵同时进到省核心小组、并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张怀英对陈永贵说，你的历史问题我清楚，我在一区工作5年，县里工作10年，

陈永贵大难不死

1940年，日本侵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寨有27名青壮年被活埋葬身。在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中，先后有35人死于非命。

谁来出面维持日本兵？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去冒这个险，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干不了。

陈永贵6岁随父到大寨，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不久，父亲因贫困潦倒，卖妻抛子，走投无路，上吊身亡。无依无靠的陈永贵就寄居在一寡妇家，为地主放牛，扛长工。他本是穷光蛋，又是从外村来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而他又不安分守己，因而受过种种屈辱。他为改变地位，奋力抗争。

陈永贵胆子大，又能说善辩，受到当时村长、地主贾泰元的赏识。1942年当了维持会代表，那年陈永贵27岁，他给日本办事，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着联系，说明他很会周旋。不

对当地的社会情况比较了解，我写份材料，让刘格平（当时的山西省革委主任）转给中央文革。1966年7月，张怀英在大寨对我说：1948年6月考查陈永贵入党问题时，就调查过他的历史问题。当时规定，吸收党员要有两人介绍，区委书记签字。我当时是大寨所在区的区委书记，对待这个问题特别慎重。大寨所在的一区是在县城周围，被迫参加伪组织的较多，一区肃反时，凡是“兴亚会”、“自卫团”的一律不登记，不填表，一笔勾销，使这些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当时的区长张立栋说，陈永贵的伪代表问题搞不清，而我对陈永贵搞“老小组”印象好，于是亲自调查，知道“兴亚会”原来是特务组织，后来成了群众组织。

张怀英按这个口径向中央文革写了材料，刘格平又把向上反映的情况告诉了陈永贵，陈永贵心情平静了些。

我地下工作者谈 “兴亚会”社会背景

昔阳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8年，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这里，一边和日军打仗，一边宣传，播下了革命种籽，在皋落等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日军占领昔阳县，经常到乡村扫荡，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的秦基伟、赖际发（支队参谋），和打入当时日伪宪兵队的我地下工作者、昔阳籍老

干部刘增玉他们都向我讲过，在昔阳县城只有100多个日本兵，凭借着有洋枪洋炮和“武士道”精神，闹得10多万人民鸡犬不宁，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棒棒队”就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汉奸走狗。日本人又通过“新民会”这些外围群众团体控制“良民”。日本的大本营叫红部，译成中文叫本部，汉奸特务的大本营叫“宪兵队”，其情报组织就是“兴亚会”。这里的监狱叫留置场，为首的日本兵叫清水，是个上士，他控制着“兴亚会”情报网，伪代表搜集的情报都送到他这里。抓来的八路军和有“八路”嫌疑的无辜百姓都在宪兵队审讯、处刑，一般都是“活着进来，死着出去”。打人、杀人，也很费力气，为了省劲，索性在西河滩挖出一丈多深的大坑，将人活活埋掉。

这个仅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日军占领期间竟有5000余名青壮年被残杀，2.9万余头牲畜被掠杀，2100万斤粮食被抢走或烧毁。



毛主席接见陈永贵

料，因一次送粮出了问题，宪兵队以通匪罪将他逮捕，关入留置场。

怎样出狱的？陈永贵自己说是八路军干部把他营救出来的，还有材料说是他妻子李虎妮托人保出来的，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是“归顺释放”，后以“兴亚会负责人”身份继续向“宪兵队”大队长清水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一周后，昔阳县城从日军溃退中解放。而盘踞在五六十华里外的平定、阳泉的阎锡山部队随时准备占领昔阳。阎方要攻，我方要守，昔阳县城经常处于“坚壁清野”的戒备状态。军民警惕性特高，只要从阳泉、平定来的都怀疑为间谍；往阳泉、平定去的被怀疑是逃亡汉奸、地主。

为保卫解放区，昔阳县领导根据《太行区1946年工作方针》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诉苦清算运动。接着就搞土地改革。

陈永贵是大寨贫雇农中的一员，却列为“反奸”对象而被批斗。

1946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的那天，昔阳县委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场就设在“万人坑”的西河滩。县委领导宣布开会后，有一项议程就是处决一名汉奸。将这个汉奸吊到树上，脱去衣服，赤条条的，民兵又用刺刀从汉奸的大腿上割一块肉，塞到他嘴里。以这种方式纪念党的生日，足见对汉奸仇恨之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曾被群众称为“二鬼子”、当作汉

奸嫌疑斗争的陈永贵，引起群众的激愤是可想而知的。

在日寇刺刀尖逃生、解放后又在反奸除特斗争中险些丧命的陈永贵，经了各种痛苦和磨难，真可说是大难不死。据说当时主持斗争会的还是当初怂恿、支持他当伪代表的贾泰元。陈永贵认为受了这些有权有势的愚弄，激发起他对这些人无比愤恨和从斗争中求生存的决心。

土改中，陈永贵 挺起了腰

1946年至1947年昔阳的土改是在“急风骤雨”中进行。离县城十几里的大寨也在清算自己血泪史。大寨村只有64户，193口人。按当时划分的阶级成分：贫下中农44户、富裕中农16户，地主富农4户。全村土地700多亩，40多户贫下中农只有144亩劣等山地，就是说，60%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领导大寨土改的贾进财、贾承福，他们按照党的政策，通过民主讨论，把土地、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

陈永贵以一个“赤贫”的“无产者”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政治上抬起了头，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主动报名参加民工支援前线。新旧社会对比，激发起他对地主富农的仇恨，对穷哥儿们的同情。他说：“现在翻了身，就要革命。”“宁死在马前，不死在马后”。他认为地主、富农本性难移，“狼

就是狼，变不成羊”。他的极“左”情绪开始暴露。一户富裕中农是军属，也分到一份浮财，他质问贾进财：“土改是给穷人的，为什么分给富裕中农？”贾进财只好收回这份浮财。

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告诉陈永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他要改变自己地位，要出人头地，但是单人独马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所作为。

“我要向毛主席请罪！”

虽然陈永贵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先锋，但对他的历史问题心里很虚，到关键时刻就慌了神。

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部队党委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谢振华（当时是第六十九军军长，后为省委第一书记）是审查小组负责人。陈永贵是“九大”代表，他知道此决定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他这段历史问题。

《谢振华回忆文集》写道：“当时我约他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我说：‘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他说，‘我在抗日战争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自首了，后来还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寇送了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我又问他，送情报和什么

人联系？陈回答：‘是和日本驻昔阳宪兵队的清水大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

《谢振华回忆文集》又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1968年9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

“遵照周总理指示，1968年12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能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批极“左”和“黑材料事件”

六十九军按组织程序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材料呈报北京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这个问题没有影响到陈永贵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央委员，也没有妨碍陈永贵1973年在“十大”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人意料的是，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整谢振华时冒出一个“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

批林批孔，实际是借题发



作者和陈永贵在大寨劳动

挥。一天，江青穿着军装到山西赴京的《三上桃峰》剧演出处，“炮轰”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谢振华。说这个剧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此剧与刘少奇毫无关系，谢与此剧也无关系）。

1972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外贸、外事和宣传会议上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山西省根据周恩来讲活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极

“左”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同时对各个行业进行整顿。工厂反对停工，保证正常生产，农村则抵制学大寨运动中搞“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实行“政治工分”等一系列“左”的作法。

山西省委批极“左”时，陈永贵却在昔阳县“反右倾”。1972年10月前后的两个月里，昔阳县连续召开县社干部会议。陈永贵在会上说，批极“左”给我们出了个难题。他要求全县干部充分认识“文革”的目的，要充分思考“每当斗争激烈的时候，毛主席要求我们干什么？”他针对一些干部怕抽调专业队上大工程会违反政策的顾虑，大批“保守”，“右倾”，以增

加专业队人数，组织大兵团搞“大会战”。

王洪文、纪登奎、倪志福、陈永贵接见山西代表时，陈永贵说：“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说：“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在这种高压下，如实向上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干部招来横祸。

1974年5月，陈永贵到昔阳县白洋峪公社等地抓典型，向干部们说“批林批孔是全国性的，我们拿不出经验是不行的”。“什么复辟，倒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都要给予迎头痛击”。

不批极“左”批右倾，陈永贵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符合了毛泽东意图，受到“四人帮”的赞赏。接着，“四人帮”又批谢振华、曹中南（省委第二书记）“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

江青说：“大寨在山西，你们应当感到是很光荣的事”；“学大寨要学它抓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不复辟，不后退。”

王洪文说：“你不学大寨的路线，学什么？”当场责令谢、曹回山西接受造反派批斗。

当时的中央要陈永贵主持批斗大会，集中批谢、曹“错误”，还要他们交代整陈永贵“黑材料”问题。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因谢振华在担任六十九军军长期间通过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报告过陈永贵的历史问

题，北京军区党委又把驻山西的六十九军领导集中到军区，要他们同“谢振华划清界线”，对反映陈永贵历史问题作出交代。新调来的六十九军政委戴秉孚是个正派老实人，他认定向中央如实反映问题是军党委的职责，没有错。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这是按组织程序层层上报的材料，不能说是黑材料，于是修改稿把“黑”字抹掉，只说是“整大寨材料”。又有人提出异议：在自己职责范围内，通过部队党委向上反映问题，为什么当错误检查？

正在争执不下，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是“文革”中能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但也不说反映问题的六十九军和北京军区党委有过错，他向六十九军领导传达毛泽东声音：

“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传下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

毛泽东在1964年知道了这位42岁才扫盲的陈永贵会讲“逻辑”，过71岁生日时特地请他吃饭，称他是“庄稼专家”，对这位“文革”中“步步紧跟”、坚持集体化道路的英雄人物关爱有加，把他领导的大寨当作农业发展的方向，一个理想的模式，中国农业过关，就靠举这面旗帜。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

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

陈锡联抗战早期是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是有名的战将。他代表中央作解释工作，说他抗战初期就在昔阳这一带打仗，那时玉米长得只有膝盖那么高；现在长得一人多高，语重心长地说：“农业还得靠大寨！”

陈永贵又是一次有惊无险！不仅未加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继1969年“九大”当上中央委员、1973年“十大”当上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陈永贵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是当作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因此议论只在这个范围内平息下来，而参与过陈永贵历史问题调查和争论的人不知道毛泽东对陈永贵历史问题的态度，只看到他地位越来越高，声望越来越大，还以为陈永贵真的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无端攻击，因此，对调查陈永贵历史的人都还当作“整中央领导黑材料”，更理直气壮地“保卫中央领导”。直到1977年初，揭批“四人帮”中，阳泉市还有人提出“整陈永贵黑材料”事件，有关人员被列为清查重点。山西日报驻阳泉记者写的《内参》中说，对王敏等29人非法审查，住进“土监狱”的6人，进清查学习班的17人，勒令“讲清楚”的3人。看管小分队三班轮番逼、供、信，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致残。直到1980年9月还未纠正“清查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

知道底里的人反问：有政

治历史问题的“中央领导”怎么安然无事？反映问题的却成了罪人？

陈永贵也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他向张怀英说：“谢振华整我的黑材料，说我是叛徒，他没资格。”他以为，只要有毛泽东保驾，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没想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紧接着粉碎了“四人帮”，又批判“两个凡是”，陈永贵领导的大寨被作为极“左”典型而受到批判。

陈永贵于1986年3月26

日在北京病逝。按说已经盖棺论定，但他的历史问题仍被人议论。1992年出版的《谢振华回忆文集》中写到陈永贵历史问题时说：“很清楚，有人证、物证和本人也承认，他确实自首叛变，又当了特务情报员。但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在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期间，竟逼着我承认整他的黑材料，企图置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政治领导人物的历史应该有透明度，让广大群众都知

道。如果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一旦发现，就告诉广大群众，也让他本人向公众说个明白，要群众理解他，他不至于背这么多年的历史包袱，也不至于身后有人再写文章数落他。更重要的是不要因“黑材料事件”让“保”他的干部群众与“揭”他的干部群众斗得死去活来。

把“黑”材料变成“白”材料之时，就是中国民主化实现之日！

（责任编辑 致 中）

邮 购 启 事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 费
牛棚杂记	季羨林	19.50	3.00
思痛录	韦君宜	13.00	3.00
朝鲜战事	徐 孔	53.50	4.00
忆周扬	主编：王 蒙 袁 鹰	36.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错案	戴 煌	28.8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经济实录	主编：王瑞璞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外交实录	主编：张树军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军事实录	主编：蒋建农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政治实录	主编：严书翰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科教实录	主编：岳庆平	80.00	8.00
中南海三代领导人与共和国文化实录	主编：张湛彬	80.00	8.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19.80	3.00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主编：张湛彬	88.00	8.00
中国改革报告	王瑞璞	48.00	4.00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张爱萍广揽人才建海军

● 陆其明

—
1999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海军诞生50周年的日子。

50年前的今天,当张爱萍将军宣布成立华东海军的时候,没有一艘舰艇,从陆军来的几万名工农同志,大多文化低,而且不懂海军。而这些工农同志又将是人民海军的重要的基础,如若全部送学校培养,形势与任务都不允许。张爱萍果断决定,向社会广招海军人才。他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6月在上海《大公报》上刊出一则通告:“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工作过,而今后决心献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登记,以备量才录用。”于是,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挂起了登记处的牌子。随着东南沿海解放,又相继在青岛、福州、广州、厦门等地设立了

“登记办事处”。同时,还在当地报纸刊登通告中特别强调:“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信、测量、军需、医务,或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记。”此举反映强烈,几个月内,就有一千多人报名登记,其中有将军,有水兵;不仅有国民党“海军元老”,还有汪伪海军军官,清末海军管带(舰长)。至此,连同由林遵将军率领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的官兵,以及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黄安”号和“长治号”护航驱逐舰起义的官兵,达到四千余名。张爱萍把这些人统称为原海军人员。

关于“原海军人员”的称谓,还有一则故事。一天,张爱萍在“上海登记办事处”听到工作人员反映:不少国民党海军人员说,我们已经登记参加了人民海军,还叫我们什么“国民党海军人员”,太刺耳,太伤我们的感情了。这个不被常人注意的问题,却引起了张爱萍的

深刻思考:这很容易在思想上与共产党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应该看到,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的初衷是对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而投身清末民初的旧海军的。现在他们转入人民海军建设,使他们走上了一个酬壮志、施本领的广阔舞台。因此,张爱萍想了几个称谓,如“新海军人员”、“原国民党海军同志”,后又都被他自己否定了。他突然想起了韩非子在《毛道》篇中对“原”字的解释:“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对了,把这些人统统称为“原海军人员”吧!管你们是清末海军,北洋海军,还是国民党海军,汪伪海军,这样就有“掩其迹”,“匿其端”的作用。这就叫做“原源为原”。这个称谓叫开后,原海军人员无不心情舒畅!

这四千多名原海军人员是陆军工农同志的最好教师。张爱萍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原海军人员的技术骨干作用,就要和陆军工农同志实行混合编制。凡是舰艇长、航海、轮机等

部门的部门长、军士长、班长，原则上都应从原海军人员中选拔；陆军工农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及各级副职。

张爱萍还对部队人员进一步作了分析：陆军工农同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作战经验丰富；短处是没有海军科学知识，文化水平低，学习技术困难多。而原海军人员文化程度较高，懂海军科学知识，有海上经验；短处是没有确立革命人生观，缺乏为人民服务思想。张爱萍把这两种人都叫做“跛子”。张爱萍针对这个情况，实行了“互帮互学”等一系列措施。实践证明，两个“跛子”的互补，很快成了“健康”的人，从而加快了部队战斗力的形成。

二

接着，张爱萍组建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选择的17名委员都是一些特殊人物。从军衔看，有国民党海军少将、中将；从职务看，有广州护法政府首脑孙中山的侍从武官、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舰队司令、办公室主任、署长；从专业看，有搞指挥、作战、训练、军械的，也有搞军需、造船、教育的。他们都留过学，军事理论基础扎实，海军实际经验丰富。

张爱萍把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首先送给林遵征求意见。林遵是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

少将司令，在渡江战役中率领舰队于南京江面起义，时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林遵熟悉每个成员，看完缄口不言。张爱萍问他有什么难处？林遵这才说了一句：“太复杂了。”张爱萍又问他：“复杂在哪里？”林遵沉思良久，说：“政治上太复杂，其中一些人还打过共产党。”张爱萍笑笑：“我都不弃他们，你反倒嫌他们复杂了！只要他们是人才，都可以用，而且要重用！”

在谈到谁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时，张爱萍提出由曾以鼎来担任。对曾以鼎，林遵也很熟悉，他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林遵对曾以鼎担任主任一职不加可否，只是提出由张爱萍自己兼任。张爱萍问他“为什么”，林遵说是“避嫌”。张爱萍说：“我们为了建设人民海军走到一起来了，不要‘避’什么‘嫌’，也没有什么‘嫌’可‘避’，让他们大胆地干吧。最多派一名陆军干部去当他们的秘书长，在军区海军首长与委员会之间做做联系工作。”

研究委员会开展工作不久，就发生了“信任危机”。本来



张爱萍在华东海军命名典礼会上(1950年)

张爱萍有个规定，为了便于开展研究工作，凡是应该让委员们知道的一些机密文件内容，如关于国际形势与沿海军事斗争形势的通报，关于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计划，等等，都应该向委员们传达或传阅。但是这条规定到了一些机关工作人员那里就给卡住了，说他们“政治复杂，易出问题”。这事给张爱萍发现了，专门找机关有关人员谈了话。张爱萍严肃地提出，对所有委员，既然要他们工作，就要信任他们，并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对于他们过去的历史问题，要一律“既往不咎”，有些委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一些特殊情况，也要特殊对待。要把他们当朋友、同志、战友。张爱萍不但要机关工作人员这样



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副司令方莹



华东海军广州舰队长卢振乾

做，自己还以身作则，从工作需要出发，多次向委员们传达许多陆军来的领导同志一时还不知道的有关机密内容。张爱萍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委员们。

对研究委员会成员的生活待遇，张爱萍定了一条原则：享受高级干部待遇，并高于从陆军来的同级干部。根据这个原则，秘书长李天钧会同机关有关部门作了几条具体规定：一律吃小灶，并额外补贴；允许带家属，住房面积可以大些；按国民党海军标准，实行原薪制；出门办事或家属、孩子看病可以坐小卧车，并优先保证使用；发什么戏票和电影票，要把好的座位留给他们，等等。这在当时国家还在普遍实行供给制的困难时期，这些规定就显得非常特殊，就连委员们自己都过意不去，纷纷要求降低生活待遇。情况反映到了张爱萍那里，答复是“按原规定办”。可是有些陆军工农同志却看不惯，甚至有的发牢骚，一时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的论调到处流行。张爱萍听了，总是循循善诱，说服这些人。

张爱萍把研究会比作“高级智囊团”。他请委员们给机关讲海军

业务课，到学校组织教学，到舰艇进行辅导，到船厂监督修船。当然，更多的是给军区海军首长出谋划策。张爱萍，还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经常带着有关课题到委员会来讨教、研究。例如请委员们审议军区海军、舰队、基地、水警区、巡防区等指挥系统的组织编制、舰艇编组编队方案，审查修改海军舰艇部队官兵训练大纲，审查修改海军训练大纲，审查海军舰船修装轻型舰艇仿制方案，以及提出扫除长江口水雷、打通舰船出海通道建议书，等等。一句话，凡是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都经过研究委员会的审议、审查、修改和提出建议。这在海军初创时期，他们立下了历史的功勋。

三

一个又一个建设海军的规划和方案出台了，紧接着的是把这些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这是比制定规划和方案更为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复和改装现有舰艇就是一例。

眼前的舰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国民党海军起义和遗弃的舰艇，由于长年只用不

修,再加上轰炸破坏,大都瘫痪在码头上,急需修理;第二类是从地方征来或从香港买来的商船,急需改装和安装武器装备。根据这个情况,张爱萍与研究委员会研究后,提出了“修旧利废,因陋就简,积小为大”的修建方针,并在江南造船厂——中国最大的百年老厂进行修复破旧舰艇,改装商船。华东军区海军党委会根据张爱萍建议,决定成立一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

请谁出任这个要职呢?张爱萍突然想到了一位早有所闻但还没有见过面的人,名叫曾国晟。曾国晟时年50多岁,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造船专业,后又去英国皇家海军攻读造船,是位造船专家,在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任过少将署长。张爱萍马上叫秘书黄胜天把曾国晟请到办公室来。

张爱萍向曾国晟介绍了舰艇现状,以及准备修复、改装的方案;曾国晟则边听边记,不时提出修改意见。两人越谈越深,谈到最后,张爱萍发出邀请:“曾将军,现在已决定成立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这个主任非你莫属。”张爱萍的诚恳感动了曾国晟,他马上作出表示:“张司令放心,我一定尽心尽职。”很快,他提出了一个关于修复旧舰艇、改装商船的计划。

开始曾国晟大事小事都要请示后勤司令部,有时还要来找张爱萍。张爱萍对他说:“你是主任,又是专家,要放开手脚

干,一般问题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张爱萍进而又强调说:“如果你决定错了,就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至于责任,有我负责!”曾国晟很是感动,干劲十足,整天跑工厂,上舰艇,还常常“夜不归营”,解决了修装中一个又一个技术难点。一天,他发现技术人员被地面火炮如何装上舰船给难住了。这的确是中外海军事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本来舰艇上的火炮,都是根据各型舰艇性能配套设计的专门舰炮。可是,目前我国工业技术还不能设计建造这类舰炮,只好安装陆军用的加农炮,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但是,这难不倒曾国晟。他同技术人员和工人老师傅边研究,边改进,很快把地面火炮装上了舰船。一试,技术诸元良好,水兵把这称作“水陆两用炮”。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134艘舰艇上安装了799门地面火炮。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技术的干部、战士。张爱萍为此给曾国晟记了头功,并报请华东军区批准,提升他担任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长。

四

如何把陆军工农同志迅速培养成会操纵舰艇的真正水兵呢?张爱萍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思考,感到急需寻找一位专家来主持训练工作。张爱萍开始明查暗访,正巧,他接到一



华东海军研委会副主任金声

封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金声的来信。金声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少将主任,曾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在南京解放时率领一些海军人员起义。他在信上说,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室的上校副主任徐时辅,正住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徐时辅要金声试探一下,像他那样政治上比较复杂的人能不能参加海军。徐时辅曾同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结拜过兄弟。但徐是美国安那波列斯海军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既有系统理论知识,又有训练海军部队的实际经验。张爱萍喜出望外,立即驱车来到徐时辅的住处求教。徐时辅开始面

有难色，说：“海军技术装备很复杂，根据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海军的经验，没有高中文化程度，不经过9至15年时间，是很难培养出一个海军中级军官的。”张爱萍进一步谈了自己的设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先知其然，不求马上知其所以然的办法，用短促的时间，突击的方法，让陆军工农同志先学急需的操船、轮机和海上射击等操作技术，然后再深入学习，轮流深造，行不行？”说着，张爱萍按动电灯开关，又给徐时辅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关于电的原理，我不要求这些陆军工农同志马上弄懂，但要求他们先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开关，行不行？”张爱萍的话打开了徐时辅的思路，高兴地说：“行，能做到！”他又介绍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45年，徐时辅率领国民党海军98人去美国新奥尔良接收“兴安”号修理

舰，出国前在青岛也是采用这种速成训练法进行训练的。舰上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刚入伍的新水兵，经过这样速成训练后，在横渡太平洋航行中，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所需训练时间不超过6个月。张爱萍听了，高兴地握着徐时辅的手说：“我以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海校校长的名义，正式聘请你担任司令部训练处副处长兼海校技术教育科科长！”

但事情并不顺利。当张爱萍把徐时辅的任命问题提交到党委会上讨论时，有些委员却提出异议，认为徐时辅能同桂永清结拜兄弟，一定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把直接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的训练大权交给这样的人，实在不放心。张爱萍据理力争，他分析说，从技术专业看，目前只有徐时辅能担此重任；从社会关系看，我们既要看到他同桂永清结拜兄弟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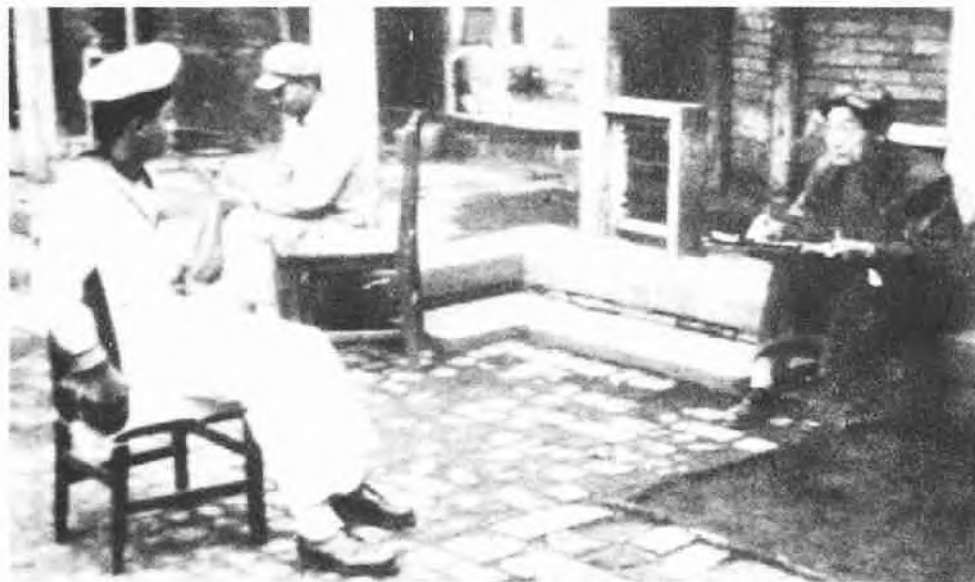
面，也要看到他爱国的一面：上海解放前夕，桂永清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要徐时辅去台湾，但徐时辅却躲藏起来等待解放；现在他又主动要求参加人民海军建设，这就是爱国行动。对这些人，我们就可以大胆使用。

张爱萍一直关心着徐时辅，就连徐时辅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也亲自过问。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要接见林遵、曾国晟等一批高级原海军人员，张爱萍特地把徐时辅带上。就在那次毛主席接见以后回到北京饭店，徐时辅悄悄地告诉张爱萍，他将要在六国饭店结婚。张爱萍听了很高兴，当众宣布了这个消息，并说：“这是喜事，我也参加。”有几位好心的原海军人员认真提醒张爱萍：“他老丈人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他自己又是桂永清结拜兄弟，政治上更复杂了。影响太大，去不得呀！”张爱萍摇摇头说：

“这有什么！”张爱萍不但参加了徐时辅的婚礼，还主持了结婚仪式，并当场朗诵了已经书写好了的一副对联。

明月夜同
尝爱情花花好
月圆鱼水含欢
喜结良缘

艳阳天共
奔奋斗路路远



这是张爱萍拍摄的：著名画家徐悲鸿正为华东海军“甲等战斗模范”赵孝庵画像

任重建设海军保卫国防

徐时辅结婚后回到南京，而把妻子留在老丈人家。他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张爱萍趁出差机会，也把徐时辅带到北京回家照顾。徐时辅调到南京后，逢年过节，张爱萍和夫人李又兰总要登门看望。这些，为大家树立了如何真诚对待原海军人员的榜样。

徐时辅不负众望。他担任司令部军训处副处长主持训练工作以后，提出了一个针对工农同志进行舰艇武器装备操作技能训练的方案。张爱萍拿了这个方案，召开训练会议。会上，苏联海军顾问，说它是“空想”。徐时辅力排众议，申述种种可行依据，最终被多数人所接受。经过半年训练，舰艇就能执行一般性任务。

随着部队教育训练的深入发展，张爱萍与徐时辅，个人之间的友谊也不断加深，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90年代。1990年，已是海军指挥学院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共产党员的徐时辅，送给张爱萍一首诗，表达他

对张爱萍将军的敬仰之情：

感 遇

建功贵创业，
立经在怀人。
吟诗纪军史，
挥笔书豪情。
傲霜赞芳蕊，
逐鹿仰青萍。
黄河奔沧海，
华夏庆龙腾。

1998年12月26日，89岁高龄的张爱萍将军突闻徐时辅同志不幸病逝，十分悲痛。他说：“徐时辅同志作为一名原海军专家，为人民海军建设付出了卓越的才智和巨大的辛劳，立下不朽功绩。”当即原韵奉和徐时辅于1990年赠他的《感遇》诗：

创业贵得人

携手开新宇，
创业贵得人。



华东海军学校教育科长徐时辅

倏忽五十载，
犹念昔日情。
列舰满桃李，
固疆铸青萍。
乘风破浪浪，
沧海任龙腾。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本刊更正

本刊今年第3期14页左栏二、三行中的文字，应是“派原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和原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笙”。16页左栏九行中的文字，应是“他们回到广州后”。67页照片说明中的“1990年”，应是“1900年”。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编辑部

告 作 者

由于本社人员不多，加之挂号信邮资一再提价，今后不刊用的稿件本刊不再退稿。要求退稿的作者，请在来稿时附足退稿的邮票。望作者鉴谅，并予配合。

编辑部

瞿秋白夫人 杨之华悲怆的人生

● 许人俊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是杰出的女革命家。

大革命时期，杨之华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共产党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为发动妇女投入革命，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推选杨之华任妇委书记。

中央妇委首次会议，在周恩来、邓颖超家里举行。但为免除外人怀疑，杨之华等妇委分别装扮成官太太、阔小姐、少奶奶模样，先后来到周宅。

事前，邓颖超特意在家中安放了一张麻将桌，八名妇委在一片搓麻将声的掩护下，开始研究工作。杨之华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她要求大家时刻保持革命警惕，谨防不测，并建议妇委们今后一律以姐妹相称。

蔡畅以杨之华是妇委书记为由，推选杨为大姐，自己甘为二姐，李文宜为三姐，贺稚华（后叛变）为四姐，邓颖超年纪较轻，为五妹，杨子烈（张国焘妻子）为六妹，七妹是一名女工，八妹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庄东晓。这就是当时名闻党内的“八姐妹”。

秋之白华 相爱至深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省萧山一富裕家庭。1923年考进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她在这里结识了瞿秋白、向警予、恽代英、肖楚女等，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1924年春，经瞿秋白和

向警予介绍，加入共产党，协助向警予开展妇女工作。

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岁月里，杨之华和瞿秋白经常在一起宣传马列主义，天长日久，感情益深。这年，他们喜结良缘。

婚后，瞿秋白特意刻制一枚“秋之白华”图章，巧妙地把俩人的名字交融在一起，既有诗意，又富情趣。后来，聂荣臻元帅曾亲切地对杨之华的女儿独伊说：“你父母的感情很好，很恩爱。我们都称他俩为秋之白华。”

杨之华活动能力强，善于联系群众，上海妇女界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时，她和向警予被选为执行委员。

1924年初，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30多家纺织工厂因长期欺压童工，无理开除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杨之华配合李立三、邓中夏等到工人中开展工作，帮助组织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进行谈判斗争。邓中夏等不幸被捕，她又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名义，组织“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迫使警察局释放邓中夏等20多名同志。

5月15日，日本大班残杀了工会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顾正红，上海大罢工高潮再起。5月30日，杨之华和孔德沚起早赶到罢工示威中心——南京路先施公司门口。她勇敢地站在板凳上，向罢工群众发表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的罪行，号召上海市民奋起支援工人斗争。租界的巡捕出动武装镇压，13人光荣牺牲，53人被捕，大

批群众受伤。这就是血溅南京路，震惊中外的“五卅大惨案”。面对大屠杀，杨之华被群众强行拉出包围圈，脱离险境。

第二天，她又不顾安危，冒着大雨，继续到南京路向商店员工们发表演说，动员罢市，支援受难同胞。她还带领女工和学生包围上海总商会，迫使大资本家签字，同意罢市。

1925年秋，向警予奉派赴苏联学习。杨之华受命接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并创办《中国妇女》杂志。1927年，在中共五届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委员。

党的六届代表大会早决定在苏联召开。1928年初，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分头前往莫斯科筹备会议。随后，各地代表也纷纷从陆路或海上赶往莫斯科。杨之华是六大代表，4月30日她同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结伴而行。为便于掩护，她们化了装，并将小女儿瞿独伊带在身边。经过海洋航行和陆上火车颠簸，她们终于到达莫斯科同瞿秋白、周恩来等会合。

六大会址设在莫斯科郊区一座乡间别墅内。瞿秋白作为党的负责人在那里抱病起草《政治报告》和《政治决议》，杨之华协助誊写文件，同时照顾小独伊，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会上，瞿秋白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了认真反思，对党内盲动主义作了剖析和自我批评，痛感自己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和理论修养，给革命造成损失，主动承担责任，态度诚恳，受到党代会谅解，代表们仍选他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共产国际留下任中共常驻代表团团长，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杨之华留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刘伯承、吴玉章、叶剑英、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都是她的同学。她只有28岁，是全班最年轻的。杨之华学习俄文进步很快，而且生性活泼，篮球、排球、游泳、越野，无不参与，为特别班增添了生气。

瞿秋白、杨之华在苏联工作和学习期间，还



杨之华、瞿秋白和他们的女儿独伊

不时带着女儿独伊到刚从中国回莫斯科的苏联顾问鲍罗庭家中作客。鲍罗庭在中国大革命期间，曾应邀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1924年5月，鲍氏夫妇受孙中山委托到上海考察。杨之华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鲍氏夫妇汇报中国妇女运动情况，瞿秋白替杨翻译。鲍罗庭提出了一些问题，她逐一作了回答，给鲍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早就相识的两家人，如今在莫斯科重逢，感情格外浓厚，亲热。

1930年，中国革命斗争处于紧张激烈阶段，瞿秋白、杨之华等奉中共中央指示回国工作。为了免遭国内白色恐怖的残害，他们决定忍痛把女儿单独留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并拜托鲍罗庭夫妇代为照料。

临行前，独伊突然患病发高烧不退，而瞿、杨二人正忙于共产国际总部的工作交接，无暇顾及女儿的病痛。善良的鲍罗庭一家人承担起救治任务，全家出动将昏迷的独伊紧急护送医院抢救治疗。

一向疼爱女儿的瞿秋白，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成了他同女儿和鲍罗庭家人的永别。

王明掌权 瞿杨遭难

1930年8月，瞿秋白等相继回国。随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右倾冒险主义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工作实际由瞿秋白主持。那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瞿秋白、杨之华肩负重担，经常化装外出活动，不断转移住处。三个月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们夫妇二人由此落难。

瞿秋白，杨之华同王明并不陌生，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双方就曾认识。

六大会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大搞反右活动。当时留苏人员中，江浙人较多，有瞿秋白、杨之华、孙冶方、蒋经国、俞秀松、瞿景白（秋白三弟）等。身处异国他乡，节假日聚会热闹一次，本是人之常情，有人却向米夫告密，炮制了一个“反党小组织”——江浙同学会，致使四人被捕，12人开除党团籍。大家向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反映。瞿派邓中夏等到中山大学调查，并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达成共识，宣布为受害人平反。

1929年夏秋，苏联开展“清党运动”，王明等多方搜集瞿秋白夫妇的黑材料，密报共产国际，恶意歪曲诽谤。甚至指使人把瞿秋白丑画成抽烟的猴子，贴在中山大学的墙报上。杨之华当场撕毁，结果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

第二年春，清党运动结束，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将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余飞等召到办公室，宣读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攻击瞿、邓、余领导了宗派活动，解除了瞿秋白的团长职务，杨之华受严重处分，邓中夏、余飞被解除了中共代表的职务。

1931年1月7日，受米夫控制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他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一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迫使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离开了政治局，最终把王明扶为党中央领导人。

在这场斗争中，杨之华被撤销了中央妇委的领导职务。此后三年不给瞿、杨夫妇分配工作，而且停发了他俩的工资。这期间，瞿秋白另辟工作天地，与鲁迅、茅盾等结为挚友，投入文化运动。他整天埋头写作，先后写下150多万字涉及文艺理论、杂文、诗歌及苏联文学的著作，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杨之华除协助瞿整理文稿，还一度到工厂打工，挣钱为瞿秋白买药治病。鲁迅先生不时送些稿费接济他们的生活。

瞿杨夫妇遭此迫害，王明一伙仍不罢休。1933年9月22日，临时党中央作出《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开展无情斗争。此时上海中央机关被破坏，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先后被捕叛变。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只好不断转移住处。

这年冬天，瞿秋白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立即去江西苏区工作，他求之不得地说：“想去很久了。”当时，瞿秋白病重，从上海到江西苏区，路途遥远，诸多不便，需要有人照顾。作为妻子的杨之华，要求陪同前往。然而，左倾宗派集团以工作离不开为借口，不许她陪伴同行。

离沪前夕，瞿秋白给杨之华找了许多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然后，又把10本笔记本分成两份说：“我们离别了，不能通信，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吧。到将来我们相见的时候，互相交换着看吧！”

第二天深夜11点，杨之华为丈夫化好装，送他到门外。昏暗的冬夜中，瞿秋白含泪轻声地向妻子道别说：“我走了。”杨之华动情地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面的！”她没有想到瞿秋白此去竟成永诀。

新疆入狱 忠贞不屈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极度伤心，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引起了中央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志的同情和重视。为了让她换个环境，决定派她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会议，借机让她在那里看病。

1935年夏秋之交，当杨之华风尘仆仆赶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会议已在进行。她当天未来得及换装，就穿着一身旗袍匆匆进入会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立即走上去迎接，各国代表也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来自中国革命斗争前线的女代表。

会后，她留在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任常委。不久，她拜会鲍罗庭夫妇，感谢他们一家人对

女儿的关照，同时把独伊从国际儿童院接到身边生活。离别五年之久的母女重新团聚。

一年多后，王明左倾宗派集团的魔影又从国内游荡到莫斯科。王明等人捏造罪名，撤销了她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的职务，停止其组织生活，甚至将其隔离审查，禁止与女儿独伊见面。同时没收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

杨之华身心受到严重损伤，精神几乎崩溃，她时而大笑，时而大哭。好心人写字条安慰她，暗中接济她。在冷酷的政治迫害中，她度过了两年的悲惨岁月。

1938年春，党中央在延安清除了王明错误路线。8月间，任弼时奉命到莫斯科，他为杨之华平了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中国部半工作半休养。杨之华重新与女儿团聚，加之又有方志纯、刘亚楼、贺子珍、蔡畅、秦化龙等留苏人员作伴，心情舒畅，身体逐步好转。

第二年，周恩来因胳膊受伤到莫斯科治病，他同邓颖超十分关心尊敬的华姐，多次邀她们母女聚会。临回国时，周恩来又特意宽慰送行的杨之华：“华姐，你不要太难过，不要太思念秋白了，这对身体不好，你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把病治好就可以回国工作。”短短数语，给她们母女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杨之华奉命带着女儿离开莫斯科，抵达新疆迪化，“新疆王”盛世才背信弃义，将我党在新疆工作的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杀害，又将刚从苏联回国的100多名干部投入监狱，杨之华再次陷入困境。

敌人用刺刀押着他们轮流去审讯，杨之华毫无惧色，气得敌人拍桌大叫，扬言要枪毙她。她冷眼相对道：“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早准备掉脑袋，我们决不改变信仰。”

杨之华是狱中党组织领导人之一，她和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秦化龙四位支部委员，通过秘密联络，组织难友开展学习和斗争。有一次，她到狱外治疗肺病，一位苏联医生趁机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塞给她，上写“同志们，你们要坚持”。她机智地藏在了袜子里带回监狱，鼓励大家斗争。

党中央十分关心这一大批干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还亲自同张治中谈

判，蒋介石被迫放人，让张治中办理此事。张不负重托，到新疆后即派迪化市长、于右任女婿屈武约见瞿独伊，说：“我是于右任的女婿，认识周恩来，也认识你母亲。周恩来很关心你们，问你们有什么困难？”屈武进一步解释，“张治中去过延安，现在新疆任职，你们快要释放了。”

随后，张治中又以私人会见方式，告诉杨之华：内战将要发生，要大家抓紧时机作准备，早日出狱回延安，并给大家一些零用钱。

张治中与瞿秋白早年有师生之情，一向尊敬他们夫妇，称杨之华为师母。我方人员出狱前，他特地宴请杨之华和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答应为患病难友治病，还派车护送131名受难人员，分乘10辆卡车，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延安。

几天后，毛泽东又专邀杨之华及女儿独伊，朱旦华及儿子毛远新到住处作客，详细询问毛泽民等牺牲经过，安慰弟媳朱旦华。尔后，他郑重地告诉杨之华母女：“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作了一个“《若干问题的决议》”。多年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不久，经过炼狱考验的女儿独伊又被批准入党，杨之华感到莫大宽慰。

奉献一生 屈死暮年

杨之华回到延安后，担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女儿独伊分配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工作。

1949年金秋，新中国在革命炮火中诞生。建国后杨之华历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委委员和常委。她虽然身居高职，但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带病深入工厂，调查了解女工们的辛苦，提出解决办法和措施。有一次，她出差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直接住到工厂女工单身宿舍里。市委负责同志得知后甚感不安。她已是花甲老人，而且体弱多病，市委请她搬进市委招待所，并为她配备专车，她婉言谢绝。坚持到工人食堂吃饭，同女工一起穿木拖鞋进澡堂洗澡，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杨大姐”。

然而，荒唐的“文革”时期，“四人帮”康生一伙，无视党中央的结论，对早已盖棺定论的瞿秋白烈士也不放过，挖了墓，砸了碑。杨大姐再次被

污蔑为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连当初年纪尚小的女儿独伊，也升格为叛徒。家中老少统统扫地出门，67岁的杨之华被注销户口，押送郊外关进秦城监狱，瞿独伊也在农科院隔离审查。

此后整整六年，杨之华在狱中只有代号没有名字。而且与外界断绝联系，家人不知其死活，社会上一度传说她已死亡，实际却在狱中经受审讯折磨。独伊和杨之华的外甥女幼英，多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经总理干预，直到1973年元月，专案组才允许家属前往秦城探监。但却把独伊列为同案人，禁止见面。当外甥女幼英在监狱看见身患骨痛的姨妈，被人扶着颤颤地走出来时，忍不住泪流满面。坚强的姨妈却安慰她说：“毛毛，我们家的人不喜欢流泪。”

半年后，杨之华的病情恶化，专案审查仍按计划进行。此时73岁的她已是风烛残年，生活不能自理。她不敢奢求“同案人”独伊前来护理，只求保外就医或让上海的妹妹杨之英来帮忙，但遭专案组无理拒绝。身处绝境的杨之华多次对专案组讲：“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她的工资被停发了，每月只有几元钱生活费，仍节省一部分交纳党费。尽管专案组不承认她这个“叛徒”党员，但她那颗赤诚之心至死不变。

几经抗争，独伊才被获准首次探监。当她看到瘦骨嶙嶙的妈妈瘫在床上，心都要碎了。鉴于她们的言行受监视，不便随意交谈，独伊只好用热水为妈妈擦身洗脚，然后拿梳子帮妈妈梳理蓬乱的头发。杨之华低声叹说：“多舒服啊！我已五年没有用梳子梳头了，他们把梳子都没收了，我只好用手指拢拢头发。”

临别时，杨之华依依不舍地对独伊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反对泪水的华姐，此时也控制不了情感，流下了伤心泪。独伊安慰道：“妈妈，你肯定会回家的。”

杨之华危在旦夕，专案组发了“善心”，允许独伊10天可探监一次。然而她前后只探监四次。1973年10月16日，离规定探监期还有六天，专案组突然提前通知独伊探监。她预感不妙，匆匆赶到，发现妈妈已奄奄一息。她向专案组了解妈妈究竟患什么病，对方冷若冰霜，置之不理。他们知道杨之华已在死亡边缘，同意恢复真

实姓名送医院治疗。

两天后，远在上海的杨之英妹妹匆匆赶到。全家老少含泪站在杨之华床前，老人紧拉着家人的手缓声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下午病情进一步恶化，可能对生命的未来有预感，深夜她在昏迷中醒来突然提出：想见胡愈之、周建人、周扬等老同志。

10月19日，她输血后精神骤然好转，医生说是回光反照。她对妹妹杨之英和女儿独伊说：“我有两万元存款（大都是瞿秋白文集稿费），一万元交党费，余下的你们用。之英孩子多，负担重，好好培养孩子们。”

下午，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等先后匆匆赶到。“文革”动乱，多年不见，久别重逢，感慨万千。杨之华见到老友相拥在床边，精神振奋，她悲壮地说：“今天，这儿人真多，正是老中青，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老人强忍心酸含笑插话：“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同学。”这细声细语，给华姐带来了温馨的安慰。

王蕴如特地带来一些葡萄，临走时她对华姐说：“你在医院没有什么吃，我给你炖个鸡汤吧！”华姐微微点头感谢，接着一字一顿说道：“我一还一吃一西一红一柿！”在场的人应声说：“西红柿好办，明天一起送来。”

第二天，华姐还没有来得及品尝西红柿和鸡汤，就含冤撒手人间了。临终前，他念念不忘对专案组说：“我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给出正确解决的。”这是女革命家的最后遗言。

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杨之华连同女儿独伊的历史冤案，一起获得平反昭雪。独伊重新回到新华社工作。如今她已步入老年的行列。但70多岁的独伊，依然精神焕发，充满乐趣。她喜爱画画、弹琴，更喜爱跳舞，她舞姿娴熟优美，风度不减当年。在中直机关友谊舞大赛中，曾获个人一等奖，集体二等奖。她远在美国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也常打电话或写信问候。一向珍视家庭情感的杨大姐，如果九泉之下有灵，定会感到莫大的宽慰。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我作为胡耀邦的秘书，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育和帮助，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

● 高 勇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3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13年，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

1952年7月，大区撤销前夕，胡耀邦由川北调到中央等待分配新的工作。此时，恰遇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调动，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在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他从那时任团中央书记，直到1965年调到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3年。那13年可以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13年，是共青团朝气蓬勃，有声有色的13年。胡耀邦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把广大团员和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青年团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胡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读书。他中午从来不去卧室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困了打个盹儿，就又开始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当时他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她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

厂，整天和工人生活在一起，工人说：“我们三班倒，每班工人都能见到李厂长。”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家来，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就会对耀邦说：“耀邦啊，你不休息，你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冲着我们说：“都去休息，有事再找你们。”每当这种时候，耀邦总是显得有几分不好意思，便说：“去吧，你们都去休息。”其实，胡耀邦和李昭一样，对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是十分关心的，只是他一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胡耀邦经常到基层作调查研究，任团中央书记时就立志要跑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每次到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也乘此机会熟悉干部，考察干部。他对要带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作记录、整理材料外，还要问问我们：这个人能不能熬夜？那个人是不是刻苦？只要一听说某人不能熬夜，他就会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直打呵欠，不但自己没有精力工作，而且还会影响别人。”

1962年夏天的一天晚饭后，他在院子里边散步边同我议论团中央的一些部长，对一些部门的工作进行评论。他心里明镜似的，哪个部门工作有成绩，有起色，哪个部门工作平庸，一般化，他都能一条一条列举出来。他说：“工作有成绩，有起色的，部长都是比较刻苦的，努力的。”当说



赠送给他一盒文具

一九八五年胡耀邦七十寿辰，高勇

到某部门工作平庸时，他忽然严肃地说：“××这个人不刻苦，不动脑子！”

胡耀邦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团干部，经常跳舞、打球，我就不相信他们比我们聪明多少，我们这么干还干不完，他们就能那么轻松地干完工作！”耀邦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我比他年轻14岁，但我都熬不过他。有时我们实在熬不住了，他就叫警卫员给他放一片安眠药在桌上，让我们先去睡，而他是什么时候睡的，我们就知道了。

“文革”以后，胡耀邦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干

1975年6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以尽快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就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良。须知，那时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好，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李昭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

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我就向耀邦说：“您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行呢？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他当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国家的多少大事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干。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每个星期要加半天班，星期日上午都到勤政殿各自的办公室办公。要不是他考虑到有的领导同志年事已高，需要照顾他们的身体的话，他大概会建议星期日全天加班的。这件事的意义不仅仅是增加半天工作时间的问題，而主要是由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形成一种勤政作风问题。耀邦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很近，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全家人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加班去了。夜深了，就在办公室就寝。我和别的同志有几次去看他，都是在晚饭后他在办公室看电视新闻时，有什么事就在这边看新闻边谈。电视新闻一结束，他就问：“你们还有什么事？”我们只要说：“没有别的事了”。他就会说：“那好吧，我要办公了”。我们便赶紧退出。他决不同你无事闲扯，不浪费一点时间。他多次说过：“我很不赞成老朋友、老熟人见面时互问

身体怎么样,分别时互嘱保重身体。应该是一见面问问工作怎么样,分别时互相勉励好好工作”。

胡耀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不但利用星期天加班工作,而且把节假日也充分利用了起来。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有六年春节没有在北京过。春节,历来是一家人团圆的传统节日,许多在外工作和学习的人,一般都要趁春节放假回家过年,而胡耀邦都是到边防海岛、偏僻农村、牧民帐篷、工人家庭,同广大工人、农牧民、战士一起过年,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共商脱贫致富的良方妙策。

凡是读过胡耀邦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没有空话套话,而是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启迪和鼓舞。但是,你可别以为他是靠自己的所谓天才做到这一点的。他也承认天才,但从来不相信有什么人是纯粹的天才。60年代郭沫若曾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天才与勤奋》,耀邦读后备加称赞,认为郭老讲的“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耀邦也很赞同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胡耀邦确有天资聪明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一面是他十分勤奋。你可曾知道,他写出一篇文章或考虑好一篇讲话需要付

出多少心血?他经常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有时一次就连续奋战24小时不睡觉,往往是他一边写,我们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们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也弄不清究竟是第几稿了。他常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因此,他十分注意遣词造句,毫不马虎,真可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了,累得他头昏脑胀,痔疮复发,他还开玩笑说:“这就叫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象到他是怎样苦苦奋战的。

胡耀邦酷爱读书,博览强记,勤于思考,几十年如一日,堪称全党干部楷模

胡耀邦写文章一般不要别人代笔,都是自己动手。即使有时请别人先写一稿,他也是自己定题目,自己搞设计,一共写几段,每段写什么,用什么材料,讲什么观点,甚至关键处使用什么语言,他都要向起草人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讲话,除了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需要写出讲稿外,一般他是不照本宣科的。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官老爷作风。他讲话时,有时用一两页纸写个简单提纲,甚



胡耀邦和工作人员在一起

至连提纲也不写，完全凭着自己的见解、知识和口才去讲，时而滔滔不绝，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绘声绘色。讲到关键处则常常站起来，辅以各种手势，讲得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给听众以深刻印象，和教益。

胡耀邦的文章和讲话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同他刻苦读书和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原有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上过一年初中。但他酷爱读书，十分勤奋，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从不懈怠，即使在戎马倥偬，转战行军的年代，他也能利用作战间隙，坚持读书。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称赞过他读书刻苦，并推荐他担任抗大总支书记。1960年冬，他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胡耀邦读书涉猎甚广，主张博览群书。据我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要我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作仔细对照，按照四卷本的文字修改到老版本上，看看毛泽东自己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强学博记，读书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划了各种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从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到1989年4月去世，两年多时间里，他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四书五经》，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等等。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读的几篇古文和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能背诵下来，常常还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一起默写。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世界各国主要名人传记，他都读过。他在45岁时还曾潜心学习英文，每周坚持请人讲课两小时。但因他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复习，常常是



学了新的忘了旧的，巩固不住。虽然收效甚微，但他这种学习精神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读书，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大业余嗜好。他平时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他想看的，需看的，他就毫不犹豫地购买，而从不问价钱。当时他每月工资缴了党费和房租剩下不到300元，常常一次买书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那时他是八口之家，两位老人已经年高，四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花销该有多大！他又朋友众多，热情好客，每月招待的客饭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由于他身上总不带钱，所以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每次跟他出去，都要准备一点钱带上，免得遇到需要买的书而无钱发窘。但是，有一次还真的出了一点麻烦。那是1960年4月21日，即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大会，我送他出门上汽车去参加会时，根本未想到会场上会售书，也就没有提醒他带钱。偏偏那次会上当场出售新编的《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他一些首长都付钱买了一套，唯独他身上一分钱没有，又想马上买一套带回来。当时这套书新华书店还未公开发售。经他说明情况，大会服务人员同意他先把书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回来，一进院子他就冲我大声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书，还没付钱。”

胡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持之以恒。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一呆几年,而且一直未得到“解放”。当时干校活儿很重,他所在的连队干的主要是打场、盖房,分配给他的活儿是去70里地外用架子车拉石头,递砖送泥,或是晒场扛麻袋。黄湖农场原是犯人的劳改农场,位于潢川、固始、淮滨三县交界地带,自然条件极差,地势低洼,气候恶劣,遍布坑塘沟壑,杂草丛生,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成团的蚊子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曾向我们“郑重”宣布过,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代农为农。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一位女同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会”上曾生动地说:“我想,人都没用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穿上高筒胶靴,都去打扇聊天了,而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马灯,孜孜攻读。1971年9月林彪出逃摔死后,胡耀邦虽然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诬蔑他为“走资派”的《审查结论》上签字,却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并结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有

读什么书,他的表情马上就会显得很严肃。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就对他们说,没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正是由于他那段时间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带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粉碎“四人帮”后,党无论要他去中央党校工作,还是到中央组织部或中央宣传部工作,他都使那里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机关面貌为之一新,以至这些部门的同志都把他主持工作期间称为这些部门的“黄金时代”。

胡耀邦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孜孜不倦地读书,是我们全党干部的一个光辉榜样。1986年10月,我把一本手册送到李汉平秘书那里,请耀邦方便时给我题写几个字。10月11日下午,李汉平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要我问问你,你想要他题写什么。”我说:“请耀邦同志决定,可以针对我的特点写,也可以针对我的缺点写,或者写几句鼓励性的话,都行。”李汉平转告耀邦后,耀邦给我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大字,并署上“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是耀邦对我的希望和鼓励,也是胡耀邦一生工作和读书精神的写照。

(责任编辑 舒元璋)



高勇向胡耀邦遗体作最后告别

送别丁一岚

● 张帆

丁一岚同志平静地走了。按她的遗愿，没有发讣告，没有写生平介绍，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奏哀乐。

但她的生前好友得悉噩耗后，自动来到八宝山，其中有现任广播电影电视局长田聪明，原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张致祥，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他们许多人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向她的遗体告别。他们徐徐进入大厅，在门口看到丁一岚生前向党组织的汇报的抄件。

给党的最后一份汇报

丁一岚在病危时刻，向党组织送上了如下最后一份汇报。

国际台党委会：

入党60年来，我多次怀着赤诚的心给党写汇报。现在多少有些伤痛之情给党组织送上最后1份汇报。

大家都知道我从1991年得了肾病，后来很快发展到晚期——尿毒症。在党组织和机关内很多同志的关怀下，在子女亲友们的关心扶持下，在友谊医院医护人员

的精心治疗中，我以坦然乐观的心态与肾病斗争了7年，这次斗争，我没有成为胜利者，不得不向你们告别。

现在乘我的思维意识还比较清楚的时候，向你们述说我对自已后事的考虑与决定：

一、当我不可能继续生存时（包括我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时），请医院帮助我安祥地离去。我的儿女们都同意医院以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帮助我避免少受些折磨和痛苦，这是我最诚挚的要求。

二、后事从简：

1、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包括向遗体告别。

2、党内外很多人了解我，党组织不必给我写生平介绍。

3、随便以什么名义都可以，发个简单的通知，说明何年何月我向大家告别了。

三、我的遗体凡是有用器官，在我的生命结束后，无偿地献给友谊医院解剖选用。

四、骨灰由我的子女在北京选一适当的山坡，种在树下，以求和大地万物共存。向广播电影电视部许多

曾与我合作过的同志们告别！我羡慕你们都能为我国国家美好的未来，为21世纪继续健康地奋斗着！

丁一岚 1998年

这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最后遗言，字迹因手颤而略带弯曲。但它说明了丁一岚是一位党性强，革命意志坚定，在荣誉面前不骄傲，成就面前不居功，逆境挫折面前不屈服，坚决完成使命的人，也证明了她是一位朴素、勤俭、努力学习，相夫教子，关心别人，团结同志的模范女共产党员。

她是国务院颁给的“有突出贡献”的一位知识分子。

一篇通讯打动了邓拓

丁一岚在学生时代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到延安，1938年入党，同年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她在平山县作妇女工作时，把东黄泥村一位因参加抗日活动而备受虐待的青年妇女的事迹写成通讯，寄给

晋察冀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看了深受感动。他并不认识丁一岚，也没有人向他介绍过，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丁一岚。从此，两人鸿雁传书，书信往来频繁。邓拓每信必有诗，丁一岚说，“老邓的诗，征服了我。”

他们初晤在风沙遍野的滹沱河畔，在战地月夜，彼此倾吐心声。邓拓写下了《心盟》：

滹沱河畔订心盟，
卷地风沙四野鸣。
如此年时如此地，
人间长此寄深情。

1942年，他们结婚，聂荣臻将军举行家宴祝贺。丁一岚调到晋察冀日报社，成为战地报人。

次年，日寇向边区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邓拓率领武装起来的战地报人，用几头骡子驮着机器，坚持游击办报。丁一岚当时怀孕在身，坚决随队工作。

9月24日夜，大队通过灵寿县北营村时，与敌军遭遇，前梯分队立即与敌交火，三人当场牺牲，邓拓坐骑中弹倒毙。他从马鞍上跳下，继续指挥队伍。丁一岚怀着沉重的身孕跑不动，邓拓拉着她的衣襟迅速撤离火线。

丁一岚艰难地走到一座山下，无法攀登。这时，突然一把铁锹从山坡竖下来，她拉着把柄爬上山去，随队脱离险境，在几户人家的山村里，开始出报。

村边派出岗哨，印刷机安装在驴圈，电台电线挂到



抗日战争时期的丁一岚、邓拓

村边，编辑在膝盖上编稿。紧张，沉着的战斗气氛，鼓舞着她坚持工作。

但是，她分娩时刻来临，无法参加游击行动了。村庄都被敌军焚烧，冒着浓烟。到哪去呢？

一位通讯员扶她寻到一个山洞，野草作褥布当门，山下枪炮声隆隆，周围没有村庄、老百姓。她心想：“反正报社不会把我忘了，把我丢下不管。”她在山洞中生下一个女孩，就是她和邓拓的长女：丁小岚。

次年邓拓写诗一首《忆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
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阵，
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国结屋依崖冷，
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
相逢举案又齐眉。

抗战即将胜利，邓拓、丁一岚同进晋察冀党校。当时中央号召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党校决定演出京戏《李自成》，可没人能编剧本，最后邓拓执笔完成。谁能演红娘子？人们说丁一岚可以。可她从未演过京剧，还是邓拓出马动员说“这是响应党的号召”。丈夫编戏，妻子演出，大受欢迎，成为佳话。

现场直播开国大典

抗战胜利，晋察冀日报社进驻张家口，成立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设在报社，日夜供稿。但电台没有播音员，报社副社长胡开明找社长邓拓要。

“要编辑记者可以，要播音员，这得你想办法。”邓拓说。

“有，你老婆丁一岚可以。”胡开明说。

不日，丁一岚到张家口上堡蒙古营上班了，成了播音员。

1946年，张家口举行公审汉奸于品卿大会。报社派笔者和李肖白采访，现场写新闻，我们写了通讯《昨日儿皇帝，今天阶下囚》。丁一岚奉命直播公审大会。她的声音清脆，感情注入播音器，受到人们的称赞。

张家口撤退后，报社、电台都到抗日时期报社的老根据地阜平县马兰村。电台设在附近马棚村，播音室设在山头。丁一岚是播音组长，她要接待、安置、培养新从平津来的播音员，日夜爬山头上班。有时连续播音8小时，紧张程度如同上战场。

新中国成立，举世注目。丁一岚是新中国第一代播音员，她和齐越负责现场直播开国大典。

那是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丁一岚与著名播音员齐越精神焕发地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播音台前，全神贯注，把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盛况，向北京、向全国、向世界直播：

“参加大会的30万人民一齐肃立致敬，目睹人民祖国的庄严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部队带队指挥员行举手礼，在队列中的干部战

士以及执行勤务的人员都肃然立正。”

这诗一般的解说词，激动着亿万颗中国人的心。

大部分播音稿是新华社记者当场写的。广播事业局负责人梅益坐在天安门城楼一个角落，一张一张地看稿，适合播音的立即交播音员。天安门游行的所有军队、民众、劳动模范、各界人士，一经出现，播音员要恰如其时地准确无误地解说。

这种现场直播，难度很大，要各方面配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需要很好准备，了解游行队伍的次序和重点。听众不能到现场观看却急欲了解游行各个方队情况，播音既要简要概括，抓住重点，抓人们所关心的场面，又要层次分明，有感情，才能使人如临其境。当时没有播音棚，丁一岚和齐越不知不觉地在现场站了7个小时。

事后，开国大典的文字稿一份也没有留下。幸好，录音带保留下来了。这千秋万代让人纪念的时刻，多亏录音带的记录流传了。

最后的日子

1991年，丁一岚患尿毒症，每周3次医疗，病情严重，但她坚持学习，每日读书阅报，努力编辑出版邓拓的遗书、墨迹。为了编邓拓诗词，她参加中国科学院老年

大学，并约我同去。

我写《才子邓拓》，多亏了她的支持帮助，才得以完稿。

1998年9月13日我告诉她，定稿写了老邓在“文革”序幕中与“四人帮”的斗争，他开会组织文章，亲自执笔，都有了，但当时的政治背景未交代清楚。我已写好补充稿，想听听她的意见，我说：“邓拓同志欲将《海瑞罢官》的批判运动，拉到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以坚持‘双百’方针，但当时已无济于事了。他被点名批判，彭真同志也被批判了。这种压力是无法承受的，邓拓同志只有以死抗争。”

她说：“当时的压力确实难以承受。彭真同志在‘文革’后，叫我家和李琪一家吃饭。对我说，邓拓调市委，我们没让他管《北京日报》，免得他为难。这事过去我不知道，还错怪老邓，哪有那么多时间写杂文，玩字画呢？”

我说：“抗战期间，老邓也搞古玩。”

她说：“那是抽空搞一点搜集古董而已。”

这次会见和往常见面一样，她热情亲切，思路敏捷，表面上看毫无病态。根本看不出这是她最后的日子。

我从书包中取出一本《空谷回音》说：“这是昨天参加王剑清（原晋察冀日报编辑）遗体告别时发的，这是她的遗著，我已有一本了，这本给你。”

“我也有一本了”。她说：“你拿来的《炎黄春秋》，我每期都有，你带回去吧。”又说：“王剑清多大去世？”我说：“76岁。”

接着她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说：“79岁。”

她说：“我76岁，不，77岁了。我们都七老八十了。”

她的话，颇为感伤。这使我猛然忆起，1996年4月14日，邓拓逝世30周年时她泪洒八宝山，在读祭文最后一段时，她声音颤抖，无限悲伤地说：“老邓，我该做的事（指出版邓拓的遗著、墨迹和学术讨论集等）都做了，孩子们都已成才。我现身患重病，我们相会的日子不远了。”

但是，面前的丁一岚仍然是倔强的，依然关心国内外大事。

晚间她派阿姨将我写的《才子邓拓》补充材料退回。她将“康生的《大事记》”这句话上，改为“康生指导编写的《大事记》”。在有关田家英之死那段文字旁写了“加在何处？”

我注意到她用的信封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筹建委员会”给她的信封，邮戳是9月11日从郑州寄来，13日北京邮局送她家的。这就是说，她用刚收到的信封，在背面写了我家地址，15日晚让阿姨立即送我的。

她办事如此认真、迅速，怎么能想到这是她的最后时日呢？



1945年23岁的丁一岚在阜平

16日晨，我接到陈春森的电话说，丁一岚家属电告，她正在医院进行抢救。

我们俩立即前往探视。路上我们俩都感到突然。我说：“前天下午，我到她家去，她还很好嘛，怎么……”

陈春森说：“昨天，我打电话给她说要她去她家谈报史研究会给有关报社的信。她说，你们定稿吧。”

赶到医院，我们看到了丁一岚平静地躺在病床上。一旁是医务人员，一旁是她的子女，都在流泪。

我们走近病床。看到导管还插在鼻子里，还在抢

救。她胸部还有突然的起动，心电图还在记录。医务人员说，这是起搏器的作用。抢救已经无效，她没有知觉了。

丁一岚同志和我们永别了。

她走得如此平静，如此安详，如此突然。但她早有准备，把一切安排好了，才离开了人间。

她给我们留下的是：她的原则性，工作一丝不苟，对同志团结友爱，讲话有分寸，对敌人顽强抗争，不屈不挠。我们永远怀念她，学习她。

（责任编辑：致中）

杨勇上将当红娘

○ 舒云

在停战后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当了一回红娘。

战地摄影记者杜心，1956年调到志愿军总部担任了摄影组长，这年才23岁。杜心来到总部后，天天在杨勇的作战办公室上班。他照相动作非常快，拍一张成一张，两年就足足拍了万把张照片。这年夏天，政委李志民对小杜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杜心还没说话，杨勇说了，人家有对象，你介绍什么对象。李政委说，哎哟，小杜你这么小就有对象啦？

几个人一起哈哈大笑。

杜心的女朋友叫顾丽芳，两人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同学。杜心参军后，小顾考上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在读大三。小顾来信，杜心大方地把信给杨勇看。杨勇很支持杜心谈对象，对他说，很好嘛，一个照相，一个当医生，我们缺少的就是技术。有时他们闹点意见，杨勇还在杜心给小顾的信上写几句，说小杜是个好青年，不应该为点小事就闹意见。

转年志愿军就要全部回国，杨勇告诉小杜，下一次休假，你把小顾接到朝鲜来。

杜心说，结婚了才能来休假，我还没结婚。杨勇说，那就到朝鲜来结婚。

杜心在首长身边摄影，算机要人员，机要人员的结婚政审严格。保卫部一政审，麻烦来了。顾丽芳是共青团员，学生会主席，她的父母是富农，姐姐姐夫在香港。哥哥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刚划为右派。这一大堆复杂关系，怎么能结婚呢？保卫部严肃地对杜心说，你是要军装还是要老婆？

一心准备结婚的杜心懵了。那时杜心单纯，不知道说什么好，自己的个人私事也不好跟杨勇讲，只得闷闷不乐。杨勇发现整天无忧无虑的杜心情绪不高，就问怎么回事？杜心说没什么。杨勇说快休假了，结婚和休假一起吧。杜心吞吞吐吐说，小顾学习紧张……杨勇问，是不是有问题啦？就叫王秘书去了解。王秘书回来一说，杨勇抓起电话把保卫部骂了个狗血喷

头，什么要军装不要老婆？我杨勇老婆出身也不好嘛，还有毛主席，还有有的人的夫人都是有钱的出身，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

保卫部硬是顶着，不准结婚就不准结婚，小顾到朝鲜的签证不能给办。

杨勇说，我们这一代没恋爱，是分配的；他们有恋爱，为什么非要这样做？我要派人再去调查。

干部部一个处长和保卫部一个副处长专门去调查了一番。回来向杨勇汇报，说本人没问题，就是社会关系复杂，不符合结婚条件。这时正忙着交接回国，杨勇说，你们先不要告诉小杜，先放一放。

回国后，新华社正准备把杜心派驻国外，《解放军画报》编辑部到火车站“半路打劫”，把杜心的行李拿走了。行李也简单，一个木头箱子，一个被子卷。这样，杜心就到了《解放军画报》，继续当摄影记者。

这时，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多后，杨勇

把杜心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结婚的问题怎么样了？杜心无可奈何地说还僵着。

杨勇说，保卫部他们不一致，我来一致。他马上把干部部的人找来，口述了三条：以国防部的名义，调顾丽芳到北京军区总医院，授中尉军衔，三天报到。杨勇说，我管不了你，梁必业副主任管你。梁原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现在担任总政副主任，他满口答应支持，说这事办得好，我们总政没意见。

那时，由国防部分配名额，部队可以直接从地方录取大学生入伍。可是小顾已经分配到开滦医学院当教员，派去天津进修三年。人家小地方好不容易分到个本科大学生，当骨干培养，不放。杨勇通过“情报”得知当地驻军军长的夫人是医学院的院长，就马上打电话找到军长，军长一口答应做老婆的工作放人。

三天后，穿上军装的顾丽芳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上了班。杜心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么个圆满结局。

杜心结婚了，杨勇这个红娘还没当完，生孩子他还要管。

1960年天灾左祸最困难之时，杜心的儿子即将出生。一天，小杜去看杨勇，杨勇问小杜，孩子什么时候生？问得很细。然后说，现在没东西吃，营养要上去。他马上到厨房，问炊事员老王，我这个月的口粮来了没有？杨勇每个月有100个鸡蛋，还有点油和肉。老王说刚领来，就这么多。杜心一看，东西还在地上放着。杨勇说，好，全装起来，给小杜。夫人林彬也



杨勇与杜心、顾丽芳和他们的儿子杜弘、女儿杜岚(1971年)

说，把我那份也拿走。杨勇的小女儿京京在一边大叫，怎么把我的口粮拿走了？

杜心坚决不要，把装上车的火腿和半条大马哈鱼又拿出来，杨勇说，你就别拿进去又拿出来了，难道革命革到你小杜这一代就不革了？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杨勇看看鸡蛋说，鸡蛋吃完了怎么办？他叫老王到鸡笼抓鸡。老王抓了两只公鸡，杨勇说，要母鸡，让他们鸡蛋吃完了，还有蛋吃。杨勇不由分说，和司机、警卫员一起把一大堆东西硬塞上了车。

在这食品极度缺乏时期，这一大堆食品比金子还宝贵。顾医生的眼泪哗哗往下流，像她那样的社会关系，在社会上是被人瞧不起的，而杨勇不仅结婚管，生孩子还管。

逢年过节，杨勇都要打电话叫杜心带儿子杜弘来家里。有一年，杜心出差，顾医生值

班，杨勇让小阿姨把杜弘抱来，杨勇一口一口地喂杜弘吃饺子，说杜弘在，才叫过年。

杜心1980年转业到上海，担任了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荣获摄影家协会颁发的荣誉杯。现在他是上海宝石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玉院院长，上海大学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他还是著名的民间收藏家和鉴赏家，拍摄了部分古玉珍品，编印成画册公开出版。顾丽芳一直搞医，已经是具有高级职称的脑科专家。杜弘从上海大学毕业，任职工程师，杜岚在挪威科技大学攻读博士。顾丽芳的哥哥是研究航天的大学教授，目前在美国，担任世界力学协会秘书长。姐姐一家在香港，来上海投资了五项市政大工程。

杜心流着泪说，这一切都要感谢老首长杨勇啊。

(责任编辑 刘文)

美国的家庭服务小时工

——访美札记

●官伟勋

门铃响了，我开门一看，见两位白人女子立在门外。一位神态庄重，一位笑咪咪地闪动着大眼睛。

庄重的那位，戴无框方型眼镜，皮肤雪白，身材健壮，金发披肩，穿白色T恤衫，白短裤，白袜白球鞋。爱笑的那位，黑发高挽头顶，插一支粉红色大型花首饰，著粉色无袖薄纱短衫，牛崽裤，光脚穿拖鞋，染着红脚趾甲，笑着的嘴，露着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二位在门外正神采飞扬挺着高耸的胸脯盯着我。

我一看到她们身后草坪外马路边的那辆黑色福特牌小轿车，和那打开的储备仓盖，便明白她们是来搞卫生的了，就赶紧请她们进屋。

她们往门里拿东西，用品有：高及腰部的吸尘器，塑料筐，大口袋。筐里装各种塑料瓶装清洁剂，大口袋里装满软柔干净的抹布，另外还有拖把、刮玻璃器、塑料鸡毛掸子等。

正在办公室画图的女儿已闻声走来。她们互相亲热

地“嗨！”了一声，女儿向她们交代了一下清洁项目与要求，二位女士点点头说了声“OK！”就先进了女儿的卧室。

她们先往玻璃上地板上和瓷砖上喷不同的洗涤剂，然后就用不同的抹布拭。二人各干各的。擦地板和瓷砖时，双膝跪在地上，擦的很认真很用力，动作熟练麻利。澡盆马桶楼梯扶手和楼梯栏杆之间，桌子椅子，正面反面侧面，天花板，墙墙角角，以及厨房灶具微波炉洗碗机沙发地毯等等，两个小时很快就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立即觉得房间高了，大了。女儿大致看了看，付了80美元的服务费，二位说了一声“thank you”，便迅速把带来的用具拿出门装上车，回头喊了声“拜拜”，就发动起黑色小轿车，一溜风驶向另一家搞卫生去了。

她们的工作方式和干活的劲头，引起我的兴趣。我打听了一下，金发的那位叫罗宾（ROBIN），黑发的叫阿曼达（AMANDA）。罗宾是头儿，

阿曼达是罗的伙计。

罗宾今年27岁，她高中毕业就在一家大型清洁公司工作，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服务对象都是一些大饭店、汽车旅馆之类。工资按小时算，公司向客户每小时收25元，付给她9元。公司可以提供一些福利以及医疗和养老保险等。

干了五六年之后，罗宾觉得给公司干太亏，而且经过五六年的严格锻炼，她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清洁工作的所有本领，她就辞掉公司的工作，自己开张干起来。

她通过广告通过电话，也通过客户对客户介绍自己。由于她一小时只收20元，比清洁公司少收5元钱，而且干起活来动作快质量好，正所谓“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她的客户和收入很快就多起来，以致多得她忙不过来了。于是，她便找到阿曼达。阿曼达是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家庭妇女，中学毕业后就没工作过，正好想找点事干，增加点收入。

罗宾是很会做工作的，

她对阿曼达说，我一小时收客户 20 元，但只能给你 12 元，因为是我给了你工作机会，清洁工具也都由我开支提供。而且，我还要教你怎么干。再说，等你完全学会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自己开业，当老板嘛！阿曼达自然就很愉快地成了“罗宾公司”的一个忠实成员了。

由于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客户自然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一倍，再加上她拥有清洁公司的名义，所以她可以用比市场价格便宜得多的价钱，购买清洁用具，成本也进一步降低了。

罗宾对自己的工作和打算是十分满意的，她说：“我每天干 6 小时，就是 120 美元。阿曼达跟我一起也干 6 小时，我可以从

她身上再赚 48 美元，加起来就是 168 美元，一个月不就是三四千美元了吗？”她还补充说：“比起去公司上班给人家干，我每天还能多出两个小时照顾家里，你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我很想给她拍个照片留做纪念。但又有些顾虑，她会不会因为是在中国人家中干活而不愿意被拍照呢？不料，我女儿把我的想法对她一讲，她不但没有拒绝，反而去把拖把拿来，说：“我要拄着拖把照！”以表明自己的清洁工身份。她的这一举动，立即使我在脑海里，与在国内把做家庭小时工看作低人一等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致 中)



本刊邮购启事

(一) 凡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 4.80 元。补购单期、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二) 1998 年合订本装订完毕，精装每套 56 元，简装每套 51 元。免收邮费。

现尚有 1997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4 元，简装每套 49 元；1996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

(三)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

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迹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自 1994 年——1998 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 至 5 期均有存书，每册 9 元（含邮资），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1

联系人：谷世章

澳门沧桑 480 年

● 立 之

澳门，从明朝正德十三年被侵占到 1999 年回归，共计是 481 年。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因是什么？

先说 1517 年，葡萄牙王国的使臣比利（加必丹末）到达广州，他带来葡萄牙国王曼纽尔的一封信，准备到北京去朝见正德皇帝：“贡方物，请封。”比利是里斯本一个药剂师的儿子，他乘风破浪带一支船队到了广州，以为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但是，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印象不好，因为几年前，葡萄牙人以海盜行径占领了明王朝保护的小国满刺加（马六甲）。这次比利要求到北京朝贡，北京礼部（外交部）通知比利立即离开广州回国，并奉诏“给方物直”，付给了贡陈的土产物品的代价。但是，比利久留不去，后来在广州负责监督海上事务的太监受了贿赂，允诺比利北上到达南京。在南京，正德皇帝恰好南巡到达，比利的译员亚三贿赂了皇帝的佞臣江彬，比利才到达北京，始终未见到中国皇帝。亚三原本华人，充当了洋人的间谍，后来被处死了。

其实，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葡萄牙或西班牙等欧洲的王国，见洋人面貌相仿：卷发、猫眼、鹰鼻、赤须，都统称为番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称之“佛郎机”人。御史何鳌上疏云：“佛郎机（葡萄牙）最凶狡，其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船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留驿者违制交通，人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主张：“乞悉驱在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庶一方获安。”

第二年，即正德十六年（1521），风流天子突然病死，这件事就作罢了。

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朱厚熄继位为嘉靖皇帝。就在这一年的七月间，葡萄牙人又以接济

使臣为辞，携来土特产品求售，守臣仍按惯例抽分，但嘉靖皇帝拒绝交易。朱厚熄接位之初，很想重振朝纲作一番兴革，所以对外关系，也要树立正气。葡萄牙人遭拒后就以武力威胁，由其将领别都卢率舰队以巨炮利兵肆掠满刺加等国，横行海上，并击破苏门答刺岛的一个小巴西国。

嘉靖二年，葡舰船入寇我广东新会西草湾，与中国海军发生激战。明朝官军首先跃上敌舰，生擒了葡军将领别都卢和疏世利等 42 人，斩首 35 级，俘获敌舰 2 艘。官军缴获了其巨炮贡陈朝廷，这是明朝政府最早见到的火炮。可惜当时官军不会使用，明王朝也不想仿造，只能陈列在北京，名之曰“佛郎机”。

自西草湾之战葡军惨败之后，敌人知道中国海防有备，不敢正面交锋，就通过走私，贩运欧洲白银、象牙、檀香、胡椒等货物换取中国生丝、绸缎、茶叶、瓷器，乘隙偷越国境。葡萄牙侵占澳门采用的策略是三部曲：首先是贿赂中国官员，混入境内；其次，扎根建筑，巩固地盘；最后，恃强霸占，独立为国。

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贿赂了驻广州的指挥黄庆，以“岁课二万两”，被允准葡萄牙船队可在澳门靠码头停泊，于是对澳门这块领地有了觊觎之心。这些船队实际是走私和贩卖人口的黑船，他们剽掠海上行旅，也侵扰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在浙江宁波洗劫了十几家庄稼户，劫走财物和妇女，还杀了十几个庄稼人。

朱厚熄决心消除海盜。诏令浙江、福建官军水陆夹攻围剿海盜，结果，葡船 35 艘被击毁，击毙匪徒 2000 人中有 800 人是葡匪。

嘉靖二十七年，葡人纠集众多海盜，大肆劫掠台州、宁波等地，官军迎击，击毙葡匪 500 人。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一面闯荡海上，剽掠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一面在广东乘隙贿赂贪官，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每年受贿 500 两白银，允准葡萄牙黑船人员上岸，在澳门曝晒水湿货物，搭盖蓬窝数十间居住。

嘉靖三十六年，葡人大兴土木，擅自建造永久性房屋，盖大教堂，修筑炮台，俨然国中之国了。

汪柏是从 1553 年起到 1571 年调离广东止，这十八年中，每年 9000 两银子进入了他的腰包。

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蔑视中国主权，不按指定地点停泊，逃税、逃避检查，从事非法活动。嘉靖四十三年，御史庞尚鹏奏议《抚处濠镜澳夷疏》说：葡萄牙人擅自在澳修筑城墙，筑造炮台，增建工事，“剑光耀日，火炮震天”、“雄踞海畔，若一国然”、“筑屋不知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为防患未然，他主张将葡萄牙人迁居浪白澳贸易。

抗倭名将俞大猷主张干脆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境。他认为剪除葡夷不足挂齿。“若以水兵数千攻之于水，陆兵数千攻之于陆，水陆并进，彼能何逞？”由于嘉靖王朝的贪官们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直到朱厚熄死去，问题未能解决。

朱厚熄的儿子朱载堉继位，做了六年隆庆皇帝，庸懦无能，无所建树，澳门问题未予闻问。传位到朱翊钧神宗皇帝时，才采用允许葡萄牙人留居澳门贸易，但采取专设管制机构严加防范的隔离政策。

到万历元年，葡萄牙人正式租赁澳门居住，每年纳租银 500 两。但澳门主权属中国，使用土地由中国政府严格管理，葡人无权买卖澳门土地，未经中国管理机构许可不得擅自兴建房屋或添置亭舍。并限制葡人出关，禁止内地人入澳，每五日开关一次，让运输粮食蔬菜互市，当时由关官监督，结市后即关闭。澳门属香山县管辖，重大事件受两广总督指挥节制。

当时管理澳门的衙门分设三个行署：即提调司，掌管查验进出口船舶、征税、把关等事；备倭司，掌管海防，抗击倭寇、剿捕海贼等；巡缉司，专司巡逻缉捕、防范奸宄。

万历年代管制澳门的措施较严，葡萄牙人不敢违抗。万历三十四年，葡人擅自在青州岛上建造教堂，广东巡抚王尊德派员拆毁，葡人未敢抗拒。

管制和隔离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葡萄牙人被围在关卡内，盘踞一方，自己组建了自治机构议事局，每三年选举一次，产生主管人员，并组建了警卫队，设立海关征税（征收外来船舶停靠澳门的商船）。万历四年，罗马天主教派来了澳门主教，从此，澳门成了天主教的东方教区，葡萄牙人从海盗变成了传教士，有了政治身份。

神宗死后，对澳门葡人的隔离政策没有改变。朱翊钧的子孙朱长洛、朱由校、朱由检，都无力解决澳门问题。天启三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任命了驻澳门葡萄牙总督，这是明朝末年第一任葡萄牙驻澳门总督，将中国澳门列入了葡萄牙殖民地。

到了清朝道光二十五年，葡萄牙女王公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接着，葡萄牙驻澳总督驱逐中国海关官员，攻占了凼仔岛和路环岛；1874 年，拆毁了关卡；1883 年完全占领澳门半岛。清朝政府对澳门问题束手无策。明朝政府因李自成造反无暇顾及澳门问题，清朝政府也有洪秀全造反，正要勾结洋人洋枪镇压内乱，因此竟与葡萄牙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承认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将这块领土就此拱手让人了。

1928 年 4 月中葡条约满期，国民党政府与之续签新约，内容无大更改。

解放后，人民政府尚未处理澳门问题，葡萄牙政府竟于 1955 年宣布澳门是葡国的“海外省”；1966 年，澳门警察又迫害中国居民，制造 12.3 惨案，死伤 200 余人。中国当时正是所谓“文革”的十年浩劫时期，也顾不上澳门问题。1973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接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我们甚至不会去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去碰澳门，最多也只会碰一点点。”但葡萄牙于 1974 年 1 月政变，旧王朝被推翻，新政府宣布放弃一切殖民地，澳门问题也就自然地解决了。1975 年葡萄牙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 1979 年开始商讨澳门问题。

（责任编辑 刘文）

也谈不可淡忘「文革」

● 李冰封

如果从“五·一六”通知发布之日算起，那么，到今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大发动，正好三十三周年。

三十三年前开始的这场全民族浩劫，在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应该说，都是少有的。成千上万民族精英，蒙冤受屈，死于非命；成千上万幸存的

民族精英，遭受非人的折磨，无法施展才能，为社会贡献力量；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打、砸、抢”被封为革命，“无法无天”被认为合法；人性中最丑恶的阴险、欺诈、凶残、奸猾、弱肉强食、恬不知耻……等等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正气沦丧，道德滑坡，流风所及，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还在严重影响着正常社会风气的建立。这场浩劫，给全民族带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大损害，还有待于以后公正的历史学家，对它作出精确的评估。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1981年党中央决议中对它性质的定评。既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那么，当然应当彻底否定它。

可是，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的视野所及，到处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在一片繁荣景象中，似乎缺乏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不少人早已把三十三年前的那场噩梦，忘得一干二净了。

哲学家桑塔亚那有一句名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中国人是不是准备重蹈覆辙？

不记得谁说的另一句名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中国人要不要民族前途？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在盛年亲历那场民族

灾难，现在回想当年情景，心中犹感剧疼。因怀着不敢忘记过去，不愿国家民族重蹈覆辙的心情，对于那场浩劫，作了如下提纲式的反思。不知对此反思，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际上，是和反右派斗争的错误发动大跃进，反右倾，以及由大跃进引来的全国性大饥饿等，一切由于决策上的错误引起的灾难，一脉相承。那都是由于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是腐蚀人的，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是不是还可以说，缺乏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一定会导致绝对的灾难？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怎样实行对权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呢？

二、文化大革命，是封建思想沉渣的大泛起。从“早请示，晚汇报”到“忠字舞满街跳”，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到“一句顶一万句”，实际上，都是封建皇权思想在当时条件下的全面复活。早几年，有人在各种名义的掩护下，对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回潮的义举，妄加指摘，这实质上是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封建回潮重新招魂。要避免重蹈覆辙，只有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五四运动提出这口号，今年正是八十周年了，但任务迄今远未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三、为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种灾难重新出现，为了避免全民族重蹈历史覆辙，一定要保护民族精英。特别是要保护代表了民族的智慧和良心的精

英，并创造一种自由讨论的舆论环境。文化大革命摧折社会栋梁，一直到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元气尚未恢复。中共党内的各类民族精英，从刘少奇、彭德怀……直到邓拓、顾准、张志新，被摧残至死者，何止千万，这暂且不去细说；在党外，这类精英，被摧残折磨，死于非命者，也何止成千上万！比如，陈寅恪，“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见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五部分。陈在史学上的贡献，且不去细说。他懂的文字，除英、法、德、俄、希腊文以外，还包括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中古波斯文、匈牙利的马扎

儿文等等）这样的奇才，这样耀眼于世界的学术星辰，也殒落于这场浩劫。其他，如傅雷，如老舍……一切知识界知名和不甚知名的精英，死于浩劫或在浩劫中受严重摧残者，只要写出名字和他们的简短经历和主要贡献，恐怕也就是一部几十万字的大书！如果这些人不死，当时，都能让这些人在各自的岗位和专业中，发挥特长，中国下一代的人才成长，到今日现状如何，当可不言而喻。这样的历史教训，难道以后还能允许重复？

四、要利用各种教育形式，教育下一代以至几代人，千万不要再去重蹈覆辙。有人希

望人们淡忘文革，可能因为他们手上留有血迹，身上留有污点。但一切良知未泯的中国知识分子，切勿上当，一定要使人们不要忘记那惨痛过去。建立文革博物馆，开展“文革历史”和“文革学”的研究，拍摄表现“文革”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编写有分量的“文革”大辞典，等等，都属于教育后人勿忘过去的举措，只有做到这些，避免重蹈覆辙，庶几有望。

这就算作三十三年后的备忘录吧！我觉得，这备忘录里，有鲜红的血，苦涩的泪，也有无数死者英灵之光的返照。

（责任编辑 杜晋）

“兵部员外郎”不是“兵部的第三把手”

编辑同志：

叶笃庄《从李钊改杨继盛对联说起》一文（《炎黄春秋》98年12期），说杨继盛官至“兵部员外郎”，即“兵部的第三把手”。这种解释不妥当。

明朝的官制（见《明史》），兵部设尚书（部长）左侍郎和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正三品），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个司，各设郎中（司长）一人（正五品），员外郎（副司长）一人（正五品）。兵部的第一、二、三把手

是尚书，左侍郎和右侍郎，“员外郎”是排不上号的。或许，叶先生的用意是为了突出杨继盛弹劾严嵩，不怕丢掉“部级”高官。

实际上，杨继盛生前死后都不是“部级”。他对嘉庆皇帝忠心耿耿，真正不惜肝脑涂地，押到西市杀头还慷慨赋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垮台，嘉庆皇帝也没给他“平反昭雪”。嘉庆的儿子明穆宗

上台，才抚恤“直谏诸臣”，杨继盛虽然名列第一，仅追赠“太常少卿”（正四品）而已。

总之，杨继盛仍然属于“人微言轻”而“敢于直谏”的典型。他敢于摸老虎屁股的斗争精神，历史是不会忘记的。最后强调一点，叶先生把“员外郎”说成“兵部的第三把手”，不过是“白璧微瑕”。他的文章内容，我十分赞同。

顺祝

选安

谭玉明

1999年1月13日

再识宁波帮

● 李一鑫 张绪文

讲述宁波商帮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但前此不久来宁波，与当地朋友重新唠起宁波帮，叙古说今之际，这个话题不但仍然引人兴味，而且发人联想，觉得内中不少耐人捉摸的新东西。

历史上的宁波帮

宁波商帮形成的时期，一般说法是在清朝中叶甚至更晚，比晋帮、徽帮形成的时期晚得多。但这说法恐值得存疑。考诸古代地輿书，以及为量不少的宁波地方史志和文物资料，就会看出，宁波人经商的传统其实很悠久，至少在秦汉以前，宁波商人就已经相当活跃了。有如下事实可为佐证：

现今已被包容在宁波市区内的鄞县，秦汉时叫鄞县，地名由来，宋代《方輿胜览》引《四蕃志》的记载，说是因为它东南边有个小山丘叫鄞山，鄞山原名贸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山丘旁边列市贸易？原来，据水文地貌勘察，大约4000年前，甬江一带不但有过海进海退的记录，而且宁绍平原曾湖泊密布，贸山当初很可能是比今天宽阔得多的甬江岸边一个高敞地点，适于摆货列市。贸字加邑旁为鄞，这是个寓意独特的专用字。“小城曰邑”，这说明秦汉时小城鄞县已代替贸山成为市场。鄞山和鄞县作为“四蕃”的“海人”前来与当地贸易之地，可能要算是中国最古老的海上贸易口岸了。这该是先秦时代贸易史上了不起的事！而当地出土文物也证明了宁波海上贸易的悠久：在河姆渡三、四期的文化层中，曾发掘出不少大小木桨，说明几千年前当地人航行江海已若家常，印证了春秋时越王勾践夸他的国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句自豪的话并非妄语。而当地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玉器、骨器等同期文

物，则显示着古越先人们所创造的生产生活用品的数量质量都很可观，应有相当部分可进入交换领域。

中国是瓷器故乡，而越窑则是中国最早的瓷窑。在日、韩、南洋甚至伊朗、埃及等地，都曾发现大量中国古瓷器，少量属于唐代以前，而大量是宋元以后产品。最震惊世界的是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岸发现的中世纪中国沉船，在国际考古界被称为“新安沉船”。这是一只长28米的八舱商船，考据家认为它是从明州（元代叫庆元路，即今宁波）驶出的，所载的主要是成千上万件精美瓷器，有很大一部分是龙泉窑（越窑一个支脉）青瓷。我国古代名瓷有“南青北白”之说，“南青”主要发源地，是分布在甬江流域的诸多越窑。“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陆龟蒙这赞美越窑青瓷的名句，诗化了它的精彩与名贵。新安沉船的文物曾在汉城设馆展出，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打捞出来的东西已成无价之宝，更因为，它还是中世纪相当繁荣的东方海上贸易史的生动证物。当然，同时也是宁波商人历史业绩中值得骄傲的记录。

事实上，中国作为瓷器的故乡，在七、八世纪以后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贩运的货物中，瓷器特别是青瓷已渐渐是其大宗。因而有人认为，在中国瓷器声名远播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其实更是陶瓷之路。而特别是从南宋开始，代表中国文明，通过海路远销印度洋沿岸诸国，又通过它们转销欧洲贵族之家的，是以明州出口的越窑青瓷为拓路商品的。正是越窑青瓷的海外畅销，刺激了中国瓷窑遍地开花，争奇斗胜。这种来自东土的器物既精美绝伦又用途广泛，成为西方人夸耀财富的上品，曾令全世界为之惊叹叫绝！

宁波地处古代“百越”的北缘，便于与中原文化交光互影，融会糅合，是其文明发育的一大优

势。此地自古人杰辈出，生产先进，为中国造船航海事业发轫之地。秦始皇南巡最远曾到达这个地方，并住了一个月，一说派徐市（福）东渡日本就是从这里组船队出发。若此说成立，我们不妨生个美丽臆想：徐市所带走的“童男女数千人”，应该就是从宁波地区精选的秀女慧男。

综上所述，可肯定地说，有丰厚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的宁波商人群体，是几千年前最先走出国门、闯向大海的中国古老商帮。他们为光扬中华文明，传输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让世界认识中国作出过不朽贡献。

近现代的宁波帮

宁波商人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中作出过非凡贡献。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宁波开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外国人堂而皇之地踏进了中国土地，中国的传统工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却也为宁波商人进一步展示才能带来了新的契机。他们凭着优秀的经商传统，更凭着不断更新观念，在晋商、徽商等日渐式微之后竟上升为国内一个最具活力的商帮。

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到宁波，在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对宁波商人有一段十分中肯精辟、情有独钟的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为什么宁波商人能做出如此业绩？孙中山指出三点：“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实业……发达者多在外埠”；“宁波风气之开，在各地之先”。所指出的这三点中，后两点应更重要，那就是：敢于走出狭小地域到广阔天地创业；敢于解放思想，开风气之先。

宁波商人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参照欧美运营方式，在各大城市建立新型企业，开设银行、证券所和航运公司。而在他们对“外埠”的贡献中，最重大者莫过于对中国近代史上以惊人的跨跃姿



李一鑫夫妇

态发展起来的城市——上海的贡献。

与宁波的悠久辉煌不同，上海几乎是瞬间就流光溢彩亮度夺目的。两地之间明显而又富于趣味的对照，正是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与古老东方之间对照的一个缩影。上海古名申，以战国时是春申君封地得名。但它还有个当地名字叫沪淞。按字意，沪是一种捕鱼工具，是在河海边缘用竹栅围成的鱼的“迷宫”；淞则是水道沟渠。所以上海又简称沪。这也就是说，最初上海不过是吴东水网和江海交汇处的一个渔村。南宋末年它发展成镇，元代置县，清代以其扼大江门户，于康熙二十四年设海关。但即使到这时它也不能和宁波地位相比。只是因为洋人独具眼光，看上了它逆江而上可直捣中国腹地的战略地位，以一纸条约强行在这里立租界开洋行驻兵驻领事，把上海滩当作东方第一滩头要地大力经营，这才以其爆发式需求，招来众多中外移民。宁波人则是移民中的佼佼者。据资料，从上海开埠到解放前的百年间，宁波一府七县陆续移居上海的人不下数十万，比其他任何城市去创业经商的人都多。他们建立会馆，组织帮会，相携互济，情同手足，很快形成一股强大势力。这也许就是有人认为宁波帮始于百多年前的原因。一时出现的宁波人帮会数不胜数，诸如：前身为四明（宁波地区有四明山）会馆、四明同乡会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所属各县镇的会馆或同乡会；以及从钱业（金融）到烟酒药杂各种行业结成的帮、会、堂、所、联谊会等等，名目繁多。帮会内极重义气，共同对外。如1909年宁波巨商虞洽卿的宁绍商轮船公司，跟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有法国背景的东方公司激烈竞争，双方竞

相压价,势在压垮对方。宁绍公司眼看濒临困境,宁波同乡会就集巨资支持虞洽卿,终于使洋人认识到宁波帮的力量,不得不转而妥协。这一事件不仅大长了宁波商人志气,也使关注此事的所有中国人大长志气。

上海市与宁波帮,同根连理,一荣俱荣。1902年,宁波慈溪人、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事长严信厚,联络商界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这是中国有现代商会之始。从那以后直到解放前,这一不仅控制着上海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全中国的最大城市总商会,几乎长期由势力雄厚的宁波人主持。然而换个角度看,这却也正是宁波帮融入大上海的必然和重要一步。

宁波商人善于审时度势,捕捉商机,追赶潮流,改造自身。他们的地位时刻受到洋商的威胁,因而痛感“师夷以制夷”的必要。洋货潮水般打进来,出口也有被洋商垄断之虞,宁波商人们凭借洋人不具备的优势,以土特产为主货,跟洋商争打进出口贸易之战。宁波商人陆维镛,发起成立上海出口公会,宁波商人方润斋则率先在上海开设专营进出口的方振记商行。一时后继者云集景从,盈利颇丰。在当时的中国政府出奇软弱之际,这股民间势力总算也为国家保住了一部分权益,争了一口气。

宁波商人又是“拿来主义”的最早实行者。洋商的钟表眼镜销路很旺,他们也办起中国的钟表眼镜业,著名的亨得利和大明公司就是宁波人王光祖开设的。“洋火”(火柴),这个家家户户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岂容长久靠万里舶来?于是,后来赢得“火柴大王”称号的刘鸿生,组建了“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使国人用上了物美价廉的国产火柴。就这样,先后从宁波帮中诞生了中国的“五金大王”、“颜料大王”、“出租汽车大王”和“船王”;诞生了第一批现代经纪人、律师、高级雇员;诞生了第一家制造并展销科学仪器的科学仪器馆;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民信局(民办邮电局)。尤可大大称道的是,由宁波巨商叶澄衷出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实行新式教育的洋学堂——澄衷蒙学堂,后改名澄衷中学及附属小学,即现在上海市58中及唐山路一小。蔡元培曾被聘为首任代理校长,竺可桢、胡适、丰子恺等曾或执教或就读于该校。在澄衷校友中,颇不乏近现代中国精英。

至此,宁波帮已逐渐蜕去其原来的封建商帮性质。中国的一个新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由宁波帮(或许还加上同时先得时代风气的闽粤商帮)带头,以上海这类大城市为舞台,粉墨登场了。

那么回顾上文,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什么那样由衷地赞扬“甬商”,那样寄予深切期望,就完全不难理解了。

有同志慨叹:尽管宁波帮有过灿烂历史,但今日已风光不再。

难道真是这样?

的确,人事沧桑,在大上海极尽风光的宁波帮,今天已不成其为“帮”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本世纪中叶,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的迁往港澳台,有的远走南洋甚至大洋彼岸,其中许多人已成为饮誉海外的华人华裔。莘莘大端者,如名列世界八大船王的包玉刚和董浩云,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王宽诚,电影业巨子邵逸夫,新加坡三江会会长水铭章,美国华侨总商会董事长应行久,欧洲中式快餐业大王范岁久,等等。还有的转入政界或科教文界,如美国第一位华裔州长吴仙标,前任美国总统里根的科学顾问毛昭宪……

据宁波市统战部门的粗略统计,目前在海外有所成就的宁波人,约有65000多人。近20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仍情牵这块故土,又为改革开放后的祖国投资出力,祖国也张开怀抱欢迎他们。

一如一百多年前宁波帮先辈们勇敢地离开四明故里,融入大上海和全国的商海,今日的宁波帮则走出了国门,融入于正在加速一体化的世界。而“帮”,作为一种带有宗法意味的历史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应有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消亡,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这绝非退步而是进步。

恩格斯在《论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说过:“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当我们谈及宁波帮的古今嬗变时,会不会也生发一种历史感:宁波帮之所以没有像晋帮徽帮那样随封建制度一起退出历史,而是在面临历史转折点时进行了新的飞跃、升华,正是因为他们紧紧地追赶上了历史的脚步。

(责任编辑 致 中)

新官堕落定律

——读史随感之一

● 吴 思



朱 元 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帐。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赴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

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很。《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官场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作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罗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子弟薛蟠，打死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命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

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四百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贪赃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帐，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

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徐均不理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

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衙。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了。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帐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帐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在基层官员的亲身经验中很有吓唬人的嫌疑。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禺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

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族。

坐镇番禺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捕，绑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

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脆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

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禺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禺，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但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

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帐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帐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刺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帐，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

朱元璋死后，皇帝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愈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愈发灵验了。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实际却很管用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责任编辑 王仁)



“五四”断想

——胡适的阴影

● 余广人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必然要想到胡适，想到胡适，就想到了44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

当胡适自美国回国，与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时，其以后被人“褒”的荣耀和“贬”的阴影，就同时笼罩其身了。

饶有趣味的是，胡适身前后得到的“褒”与“贬”，均是同一个思想造成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师从杜威。因此，在新文化新思潮涌动的五四前后，胡适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青年趋之若鹜。当时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的《发行旨趣》中，认为“现在世界上的最新思潮的是讲‘实验主义’”。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曾“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

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但是，当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后，在风云剧变的时代大潮中，胡适所遵守的实验主义，使他不愿意正视阶级利益的尖锐冲突，本能地反对任何激烈的革命手段。他与崇信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的歧分日见，终于分道扬镳，他的观点也很快被热血青年所抛弃，并招来了批判。

在那场众所周知的“问题与主义”的内部论争后不久的1922年，胡适用《努力》周报支持王宠惠的“好人政府”时就被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斥责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到了30年代，郭沫若对胡适的批判就有点挖苦意味了：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细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私生子。……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边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

义。”

但是，郭沫若的这种近于谩骂式的批判尚属特例，很多人还能保持公允的平常心来看胡适。1937年，胡绳在《胡适论》一文中认为：

“正如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思想中的进步处，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他的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在他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中也有着合理的成分。”

“胡适的思想方法是贩运来的西方的没落的布尔乔亚哲学，这确是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值得注意：在胡适的书里的实用主义是用来打击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而在杜威、詹姆士的手里，它除了是哲学和科学的堕落以外再没有别的意义。二者之间多少是有点不同的。”

“而且比较起有些空买空卖的‘学者’‘政客’来，倒还是胡适的遇事不苟且，尊重事实，注重具体问题这种态度值得在战斗中间学习。”

应当说，胡绳的这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

代表了延安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因为前引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的谈话即是在此前后。毛对胡适所持的赞扬态度至少表明：中共或者没有把胡适看得非常重要，或者是因为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反感。

事实上，不管在30年代还是其后，胡适似乎未关注过共产党人什么事情，至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吉庵的《胡适传》中，我们看不到他对中共的谩骂和恶意攻击的言辞。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三年，胡适便被树为批判的靶子，在其后的几年里成为人们批判甚至是肆意攻击的对象，《胡适思想批判》即是这场批判的产物。

关于发动这次批判的原因，近代史专家雷颐在《破立之后——读胡适研究丛录》一文评论道：

“新中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一次社会结构的深刻革命。这种社会变动必然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要求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即科恩所说的‘科学革命’。这场‘科学革命’要求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范式’取代以经验论实用主义为基础的‘范式’。”

当然，选中胡适，还有这样的原因：大批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与胡适几乎有同样的受西方影响的经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称呼，使这批留学的知识分子即使不是胡适的朋友，也知道胡适的名头。这样，把胡适树为靶子，其威慑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胡适的这场批判，到

1954年12月底成立“胡适思想调查批判委员会”，运动出现了令人生畏的规模。从《批判》所汇集的大量文章中可以看到，这场批判触及了胡适生平的每一个阶段，他的哲学，他的学术成就，他作为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生活经历，以及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关系，等等，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密的和批判性的查验。许多他的“朋友”、门生后学，都出来公开忏悔他们以前对他的尊重。当然，在一些文章中也有辩证唯物论者理论性说理。

这场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所起到的积极意义，勿庸再论，但应该承认，批判中的许多论点都是仅凭个人偏见甚至是从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的。在全面否定他的同时，把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作用也一笔抹煞了。

胡适潜心于学术研究，只是“为了提高北大的威望，迎和反动统治阶级的装门面的需要，扩大他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工头的影晌”；胡适的政治重要性，被夸大到了和“蒋介石两一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的程度；关于他在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实验主义，被说成是“妄图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抗中国人民革命巨浪，以挽救其主子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垂死统治”。有些人则领悟出了他甚至更阴险的目的：“胡适的阴谋是让青年们沉浸于支离破碎的考据，相信一个古字义的发明价值等于发现一颗恒星。这样才能使青年们远离马克思主义，不去接受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才能使他们脱离现实，脱离革命。”因为胡适这种阴谋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在以后那场浩劫中人们熟悉的语言：“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狗！”

对这场批判运动，远在美国的胡适在自己的寓所对他写自传的唐德刚说：“这张单子（指1954年“胡适思想调查批判委员会”所开列的批判的九项内容一一引者）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作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

在这自嘲的口吻背后，胡适想到了什么，我们无从揣测。但是，看着八本《批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影子确实是被淡忘了。再看看《胡适传》、《胡适研究丛录》、《胡适研究丛刊》等，不禁哑言失笑。还是雷颐的话是对的：“从30年代的《胡适论》到50年代的《胡适思想批判》，再到今天的《胡适研究丛录》，历史在更高层次上“重复”，一种新‘范式’的破后之立。”

事实上，不独对胡适的批判的结局如此，单就对胡适的批判而言，“民主”与“科学”范式”的确立的曲折，就足以令人沉思。因此，在轻轻翻过这沉重、深刻的历史一页时，眼前出现的仍是90年前的那面“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因而才写下这样的闲话。

（责任编辑 致 中）

美国制造的“银河号事件”

● 陈文如



中沙代表及美国顾问签署检查报告

1993年7月，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载了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酸氯两类化学武器前体正运往伊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航行中的“银河号”货轮被迫在波斯湾沙特的达曼港接受检查。事态发展关系着中国的尊严和国际声誉，作为现场采访记者，我目睹了美国人无视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蛮横行为，怒火中烧，当《检查报告》一宣布《银河》事情清白无辜，我立即抢发了消息，让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尽快传遍全世界。

《检查报告》是由中沙美三方政府代表签署的。《检查报告》说，通过对“银河号”货轮上“全部集装箱的彻底检查结果表明，船上未装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酸氯两类化学品”。至此，美国指控的谎言彻底破

产。

我原在新华社阿布扎比分社任首席记者，“银河号”事件发生后，我奉调参加中方检查组赴达曼港报道“银河号”货轮货物检查事宜。8月27日，我随中方检查组进入达曼港，“银河号”已停泊在封闭泊位内。海上沙特快艇巡逻，岸上军警把守，如临大敌。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全集装箱货轮，定期航行于中国天津新港和波斯湾之间，1993年7月7日，开始它的第81次正常航行。共载628个集装箱，驶向中东。

美国以获得情报为由，振振有辞地宣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这一出口行为，否则就要制裁中国。8月3日，美国竟然要求中国政府命令“银河”轮返回出

发地；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或者停留在某个地点听候发落。

从8月1日开始，正行航行中的“银河号”船员发现一艘美国军舰紧紧相随，船长张如德凭他多年航海经历，觉得情况异常，3日上午8时，“银河号”到达阿曼湾后，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银河”轮上空盘旋拍照，查问“银河”轮货运情况，以及出发港、目的港等。19时30分，“银河号”货轮按公司指示在阿曼湾距霍尔木兹海峡约11海里处抛锚待命。此时，美国军舰61号、975号、996号，轮番在它前后巡逻，掀起层层恶浪；美军飞机、直升机、侦察机不断低空盘旋，卷起阵阵狂风。

由于货轮长时间漂泊公海，淡水、食品开始短缺。船长张如德要求大家节水缩食。锚泊的当天他们就开始降低伙食标准，由平时的三菜一汤改为二菜一汤，数量也明显减少。为了节约用水，有的人甚至一个星期没洗澡。人体质下降了，病号增多了。美国人从军舰上给船长打电话说：“我们可以为你轮提供油料、用水以及食品。”张如德断然拒绝：“我们不需要！”

“银河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抛锚10多天后，经过政府间的交涉，又向西南方向移了38海里，停泊在阿曼海公海上。8月19日从

阿联酋服务公司得到燃料、食品和水的补给。又经过多方努力，“银河号”决定进入达曼港，由中国政府代表与沙特政府代表一起进行检查。美国派专家作为沙特方面的技术顾问参与检查。

8月26日，中方检查组到达达曼。当晚，中国政府代表同沙特和美国政府代表举行会谈，中方再次重申了中国严格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强调中国对这次检查持严肃认真态度，并表示同意对发自中国运往伊朗的29箱货物开箱检查的要求。8月28日上午，美、沙人员在中方人员陪同下对船上货物进行清点和浏览检查。船舱内潮湿闷热。美方检查人员，脱去上衣赤膊上阵，他们拿着电筒，在漆黑的船舱内寻找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核对箱位。

8月29日9点，中、沙、美三方检查人员又分别进入检查现场。

当时我头戴遮阳草帽，腰背几公斤重的工作包。照相机、录音机……到上午10点10分，开箱检查开始了。第一箱打开，全是一些铅封黑色铁桶。美国技术专家们喜形于色，疾步向前，当他们被告知里面是固体染料时，他们不信，仍从中间掏出两箱打开看个究竟。接着美国检查人员翻箱倒柜，即便是运往伊朗的装鞋纸箱他们也不放过，我特地拍下他们的表演。这天上午，美国人接连开了25个自中国运往伊朗的集装箱。晚上，又接查了其余几箱，直至午夜，集装箱全部开箱检查完毕，根本没有美国所称的化学武器前体——硫二甘醇和亚硫酸酐两类化学品。

美方在运往伊朗的货箱中未查到他们要找的两类化学品，提出

次日要查自天津新港和上海港上船的所有货箱。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要求。但是，结果又使他们失望。美国人心慌了。于是，他们怀疑“情报”有误。据他们透露，美情报机构提供的箱号是CSAQ3101和CSAQ310号集装箱。中方欣然同意。但开箱一看，却是运往巴基斯坦的扑克牌。

至晚上11点左右，凡美方怀疑并认为要查的从中国运出的货箱共49个全部开箱查完，结果仍一无所获。于是他们便把赌注押在31日化验结果上。那天上午，三方化学专家从发自中国的五箱甲酸、二箱农药、一箱松节油中取样。中国化学专家认为，这几种化学物，用不着化验就能断定不可能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酸酐，而美国技术专家则只要发现液体化学品便觉得可疑，非要取样化验不可。取样时，美、沙人员却如临一场化学武器大战，全都戴防毒面具、着防化服，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那天上午，美国政府特意从华盛顿派专人乘军用飞机送来了试剂。化验结果，上述化学品都不是硫二甘醇和亚硫酸酐。

美国人不甘心，一次又一次要求扩大检查范围。美方代表认为，美方只检查了“银河号”部分货物，“不能公开承认船上未载硫二甘醇和亚硫酸酐两类化学品”。

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中方代表指出：你们一再撕毁原先达成的协议，出尔反尔，不守信义。中方郑重宣布：“为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了结此事，中方在对美上述要求持反对立场的情况下，同意扩大检查。”为防止美方继续寻找托词，再次反悔，中方提出出三项前提条件：

一、以书面形式承认迄今验货

结果，即所有发自中国的49箱货物中，没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酸酐两类化学品。

二、承诺在完成对“银河号”所载货物检查之后，与中国和沙特方面代表共同签署检查结果报告。

三、承诺将上述检查结果通知中国货轮“银河号”预定靠岸港的有关国家政府，确保该轮进入有关港口卸货。

根据这次会谈达成的协议，“银河号”所载货柜全部开箱检查。不过开箱越多，美国人显得越紧张，越难堪。在铁的事实面前，美国人不得不认输了。9月4日中午1点，中、美、沙三方代表正式签署“银河号”《调查报告》，确认“银河号”货轮未载有上述化学武器前体。《检查报告》说：“美国政府承诺将上述检查结果通知中国银河号预定停靠港的有关国家政府，并努力确保银河号货轮顺利进入有关港口卸货。”沙特代表当场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

“银河号”事件无端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给中远公司造成了1293万美元的重大经济损失，中国政府代表沙祖康在达曼发表声明说，中方完全有理由要求美方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制造类似事件。

9月6日，“银河号”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国远洋货轮“银河号”在彻底揭穿和击败了美国的诬陷之后，胜利启航，驶离了达曼港。

“银河号”事件已经过去。最近，一桩更离奇的“泄露核武机密”事件发生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又面临一场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 方实)

马万祺诗中的情怀

● 吴跃农

马万祺 1919 年 10 月 21 日出生于广东南海，祖父务农，父亲经商，他 15 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两年之后，他接管了父亲遗下的商务，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当家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信奉“大德不逾垣，小德出入可也”的准则，他为人随和，商运通顺。

马万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我同胞，掠我财富，他怒火中烧，写下了：

可恨倭奴太逞凶，
同仇敌忾怒发冲。
牺牲已到关头后，
万众一心扫孽戎。

他毅然投入抗日洪流，参加了支援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日救国行动，到处奔走募捐，在广州、佛山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

广州沦陷，马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是时，他并没有悲观消极，他知道红军长征的伟迹，知道东方不灭的灯塔在延安，1938 年 10 月，他在《广州失守》一诗中写道：

凶残狼日寇，
铁蹄践羊城。
东南何不振，
瞩望在延京。

珍珠港事变后日寇铁蹄踏进香港，马万祺刚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魔爪攫碎。他只得在澳门拓展，站稳脚跟后，又开始支持内地的抗日活动，他组织抗战物资向内地输运。

1949 年 4 月，我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马万祺闻讯，兴奋异常，夜不能寐，赋诗言志：

闻道大军过长江，
雄师勇猛世无双。
滔滔天堑等闲渡，
楚楚南都旦夕亡。
草食壶浆迎解放，
佳肴旨酒庆重光。
倒悬已解人欢畅，
歼尽顽军早建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 年，他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与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在澳门，他每年都积极组织 and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悬旗张灯，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他还数十次地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共享祖国建设成果，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为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马万祺联络了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为新中国首都建成第一

家现代化宾馆——新侨饭店。

马万祺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在澳门，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政策，马万祺为此“无比兴奋”，他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四座大桥，使从澳门到广州之间的交通得到改善。

马万祺在家乡和内地进行了大量的捐赠。他向家乡南海县和内地的捐赠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多个方面。1991 年华东水灾，马万祺捐赠港币 100 万元，并亲自去华东灾区慰问灾民。

1987 年 4 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 1999 年回归中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他兴奋激动，当晚即赋诗抒怀：

国土回归已有期，
同胞雀跃庆庄仪。
百年虚约原无义，
数世流言未见基。

往事纷争非厚福，
前程远望总相宜。
中葡友好量轻重，
善始善终共展眉。

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马万祺参加了历时4年零5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起草拟定工作，他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

发展西区豪壮志，
借君杯水桶油偿。
天时地利人和济，
锦绣前程未可量。

这是马万祺作于1991年的《参观珠海新区后有感》。

马万祺是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活动十分繁忙，近年来，他曾到广东四会县、云浮县、德庆县、罗定县、佛山市、万县、高要县、肇庆市和珠江三角洲视察，对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运输、商品销售及环境保护、劳动保护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

早年，马万祺与廖承志及何香凝就有友好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李济深、李维汉、陈叔通、王震等中共和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有交往。50年代初，叶剑英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马万祺因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与叶剑英结下深厚友情。正是在叶帅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国参加祖国各类工业建设投资，凡是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提议和要求，只要合理的，又能办到，叶帅都亲自料理，即使办不到，也向他们解释清楚。

安邦定国传千载，
厚德真诚载万年。
有幸亲情垂四代，
长江浪盼后推前。



马万祺受到邓小平亲切接见

这是1986年10月马万祺悼念叶帅的祭诗。马万祺和叶帅相交数十年，不但在祖国建设事业上相互支持，叶帅还关心马万祺次子马有礼的婚事，与廖承志商量，为他介绍了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结为秦晋之好。马万祺为此赋诗曰：“亲友来，挚友来，一片真诚两不猜，思情满载回。”1969年至1970年间，马万祺的肺病发作，叶帅知道后，特别关心，要他将病历从澳门调来，并请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著名教授钟惠澜和著名肺科专家为马万祺诊断。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马万祺在澳门欣闻喜讯，当即挥毫，作诗为贺：

电闪鬼狐警，
将军一怒平。
十年伤浩劫，
今日破坚冰。
德厚人歌颂，
风调物阜生。

鞠躬钦尽瘁，
济济庆功成。

1997年7月1日，香港胜利实现回归祖国，马万祺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回归仪式，之后他在澳门发表讲话，肯定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英明构想，并对1999年12月22日实现祖国统一的第二站——澳门的回归充满信心。

历经沧桑四百年，
思亲情切众心坚。
和风霭润莲花雨，
祖国关怀镜海妍。
幸藉会堂偿夙愿，
喜同各族庆团圆。
欣期九九回归日，
大业康歌一统篇。

这是马万祺为人民大会堂澳门厅题的诗，也是这位著名澳门爱国人士的心声。

(责任编辑 刘文)

于右任秘书 谈于老 晚年轶事

● 俞乃蕴



86岁时的于右任

何南史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私人秘书，现任台湾监察院顾问，世界诗人大会主席。何先生自1952年直至1964年11月于老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于右任老先生的私人秘书。他从台湾来安徽，我陪他到各地参观访问，他向我讲述了于老晚年动人的生活点滴……

晚年的“三乐”

何南史博士告诉我：于老晚年把看书——写字——聊天作为乐事。

于老平易近人，平时一些亲朋故旧常来聊天。故国的风物，故人的近况，往昔的珍闻，家园的悬念，等等，都是聊天的主题。“南社”诗人李根源老人，云南腾冲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协助蔡锷将军共谋云南独立，对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有汗马功劳的。于老在大陆担任国民党监察院长时，李根源是监察委员兼云贵监察使，曾与于老有诗词唱和。于老离开大陆以后，1963年，海外误传李根源先生在大陆逝世，于老很伤感，发表了《五十二年口号》，表达了对李根源先生的怀念。

谭胡于李兔几年，风起云扬不共天。

君等先行予有待，再挥血泪洗山川。

诗中所说的谭、胡、于、李是指谭延闿（1880—1930）、胡汉民（1879—1936）、于右老、李根源（1879—1965），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的。“君等先行”，是指除谭、胡早已逝世外，李根源也逝世了，其实，当时李老还健在，住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根源看到于老的诗，感慨系之，当即依韵奉和了两首：

其一

偕君革命正英年，誓倒清廷不共天。

辛亥功高终未竟，人民继起壮山川。

其二

四人祝寿记当年，
今剩麻髻迥隔天。
蜀不翻然归祖国，
共挥椽笔写山川。

李公说的“蜀不翻然归祖国”，可能是对于老的误解。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李根源老先生这么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曾以于老书法艺术的发展，请教何博士。何说：“于老在抗战以前所写的字，魏碑的味道浓；抗战时期直到离开大陆，几乎都写狂草，笔透纸背的苍劲，洒脱、奔放的气势，这大概与他当时的心情有关；到台湾以后，年事已高，已感力不尽心，大都写的是行草。”

我对何博士说，我曾听说，于老在南京住宅旁有个小巷子，有些人常常在此随地小便，于老特地写上一张纸条贴上：“此处不可随地小便”。后来，不知是秘书还是副官把它揭了下来，重新组合了一下。“小处不可随便”，请裱画店把它裱起来。何先生说，“这事我也听人说过。这位老兄是挺精明的。于老的所有印章已随棺安葬了。于老的印章都出自名家之手，伪造是很难的，也容易识破。再说，于老的书法造诣极深，不是一般人所能及，赝品总是有破绽的。”

故乡长望白云深

于老晚年特别怀念远在陕西的结发老妻高仲林。

两戒河山一支箫，

姜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
留待金婚第一宵。

末句后，有一小注曰：明年是结婚六十周年。

1959年又作《思念内子高仲林》云：

梦绕关西旧战场，
迂回大队过咸阳。
白头夫妇白头泪，
亲见阿婆作艳装。

1961年3月，寓居香港的吴季玉先生向北京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于老的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八十大寿，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想到这里，我十分伤心。”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让罗青长给于老的女婿屈武打了电话，说：总理决定让你到西安去，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80大寿。于是，屈武赶到西安，为于老夫人做寿。事后，又把当时拍的一些照片托人捎给了于老，并婉转地说明这是“濂溪先生”的关怀。于老一看就知道，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托人带来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周总理听说以后，高兴地对屈武说：“只要于老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安心了。”

1963年秋，这位转达于老心迹的吴季玉先生，惨遭国民党军统局分子李裁法的毒手。当时，台湾有些报纸为了洗刷李的罪责，大肆污蔑吴季玉。于老得悉后极为气愤，立刻让副官扶他到极乐殡仪馆悼唁致哀，并以国民党元老资格，邀请他的亲朋故旧谷凤翔、胡珺、

刘玉章等，共同为吴季玉先生主持公道，最后迫使台湾当局对李犯绳之以法。

“监察院”的风波前后

何南史说，蒋介石对于右任这位国民党元老是尊敬的，执礼有加。

1958年5月8日，是于老的80大寿诞辰。蒋介石、宋美龄等100多位党政军官员和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平时冷冷清清的于公馆，顿时宾客盈门，高朋满座。贺客中馈赠诗词的很多，于老特别欣赏许世英将军的祝嘏诗：

祥麟威凤众称贤，
白发长髯望若仙。
早岁思潮倡革命，
壮年勋业着先鞭。
惊人翰墨龙蛇走，
盖世文章金石坚。
寿晋期颐推大老，
来春燕市为开筵。

许世英这首七律，纵论了于老的生平，比较完整而恳切，特别是“寿晋期颐”之说，更是讨了老人欢心，于老很希望自己活到100岁啊！这年春节时，于老参加陕西同乡会春节团拜归来，即兴写了三首诗，表达了这种期待的心情。仅录其一：

人生百岁不稀奇，
生理家言已断之。
容易高龄百四五，
万般进步待人为。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早在几十年以前，他的老师，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过生日，于右任前往祝贺，马老

于院长坚持要去，只得让他乘车前往，到了山下，车辆无法前行，由于于老年事太高，力不从心，只得在山下行三鞠躬礼，向居正告别。”

1962年以后，老人似乎觉得他快要接近生命的终点了。他在日记上记录了这一心迹：

1月12日：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地，可以时时望我的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1月22日：葬我于台北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1月24日：黎明，彻夜未眠的老人，写下了他著名的诗篇：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这一时期，老人的心境更加悲怆，也显得更加衰老了，胡须开始脱落，笔力衰退，旧病缠身。

据陈立夫先生的回忆：“他有近两尺长的胡须。我曾问过他，睡觉时胡须怎么办？他说：‘将胡须打个结，放在被子外边。’”

熟悉于老的台北记者于衡是这样描述的：

“右老生前，人们只看到他生活完好的一面，却少有人知道他的痛苦。甚至在他病中，还有一个监察委员半强迫式的向他求字。”

“在他生命史上最后两年，他痛苦的日子比快乐的日子多。在风雨的黄昏，我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坐在房中打盹。一本线装书，滑落在地上，那象征着一个老人的寂寞。在他逝世前一年，已经不想吸烟，那时到青田街来聊天的人，似乎也愈来愈少，每年除了生日那天热闹一阵子。平时已经‘门庭冷落车马稀’了！不过，他每天照常到监察院办公，并替人写字。据他自己说，他为人写字是还‘字债’。”

1994年5月19日于衡在《追述于右任逝世前后几件往事》中说：

11月10日上午10点钟刚过，于老的主治医师丁农向有关方面报告：于老已进入弥留状态。在这之前，他告诉守在病榻床边右任先生的长子于望德，于望德给丁农的答复是：“爹爹还有许多老朋友，应该给他们见最后一面。延续老人的生命，让他晚走一些时候。”于是，丁农给老人打了一针强心针，蒋经国、谷凤翔、杨亮功等官员，来向于老先生告别。

1964年11月10日，86岁的于右任老人终于在他生命的终点停步了。

于老逝世以后，人们打开他的保险箱，清点遗物，这里没有什么金银珠宝，也没有股票证券，只有几卷日记、书札，以及为其三公子于中令出国留学筹措经费所出具的借款单，还有平时挪借身边副官数千元的帐单，陕西老家的高仲林夫

人为他亲手缝制的鞋袜，老人也珍藏在保险柜中。人们清点着，看着，想到老人“为官一生，清风两袖”，不禁凄然泪下，也由衷地感到无限敬意。就在这一年，为了筹措于中令出国留学的经费，于老的亲朋故旧张一寒、刘延涛诸先生，搜集了他老人家的历年书法作品，于1964年5月1日出版了《右任墨存》一大册，公开出售。蒋介石得悉后，觉得影响不好，即令悉数收购。于老的经济矛盾这才得到了缓解，而《右任墨存》这一巨著，却极少“飞入寻常百姓家”。

治丧委员会鉴于这一情况，决定将《国殇》一诗作为遗嘱。

于老的遗体，安息于“高山之上”。何博士告诉我，于老塑像立于海拔700公尺的山上，棺木为香杉木，有7寸多厚，重约500公斤。

墓园于1965年3月动工，7月完工。墓园坐南朝北，面向大陆，建有墓道、石碑坊，由下而上的台阶143级，墓园分三层，一、二两层分别建有华表和石狮，第三层是墓场，墓碑上刻有“于右任先生之墓”，碑后刻着墓表。

人们站在于髯公墓前，似乎能听到大海的呼唤，感到于老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唤：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责任编辑：刘 文）

田家英雁荡论文章

● 冠 西



冠 西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4月，田家英同志奉毛主席之命，来浙江考察农村工作。去温州途中，我们陪他游览东南名胜雁荡山，夜宿灵峰寺。

是夜，月朗星疏，远近峰恋，朦朦胧胧，如倚天合掌，如雄鹰敛翅，如犀牛望月，如金鸡报晓……千姿百态，诡谲雄奇，发人遐思。

望着这迷人的梦幻般的月夜山景，田家英同志忽然似有所感，用他那浓重的四川音对月吟起词来：

“天接云海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未有惊

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吟罢低头漫步，唏嘘不已，似有所思。

我夸他好记性，李清照的这首《渔家傲》，竟被他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他的沉思被打断，望着我微笑了一下说：“还要听吗？再背一首给你听。”

于是，用一种更加深沉的语调，吟起了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金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吟颂诵之间，流露出忧国忧民的淡淡哀愁和前途未卜的迷惘。特别是吟到“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难诉？”时，更是令人有慷慨苍凉之感。

问他何以记得清这么长的一些古人词作，他似乎有意回避了此时的所思所感，却说起所谓从文的问题。

他说：“历史上的文章家，不可能不会背很多东西。我们也要学会背很多东西才好。这不只是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从文的一种本能和需要。”

我请他继续说下去，他说：“那么就进屋去说。”这样，在僧舍昏暗的灯光下，就开始了一场饶有趣味的、有问有答的、关于文章的促膝漫谈。我也按照当记者时的老习惯，不客气地在他面前摊开了笔记本，尽可能地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

以下就是当时所作笔记的片断：

小孩子学说话的规律和人们学写文章类似。小孩子总是听了很多话以后才学会说话。人们写文章总是要看许多文章，才有学会写文章的可能。

所以，我说要学会背很多东西。背得多了，写时很自然地就变来了。这东西非常重要。记了很多语法句子的构造，就能潜移默化、灵活运用。

写文章总是从模仿到创造。要创造，首先要模仿。

句子，归根到底是两种：说明句（事物）、叙述句（过程，……了之类）。复杂化以后还有感叹句。但这也属于以上两种。虽是如此，运用起来变化极多。一个句子既是说明又是叙述的也有。

头脑里要有许许多多文章。不光记它的思想、表现方法，还记它的句子。

文法不要讲究得繁琐，但总还要合文法，以便使人看懂。“形势比人还强”之类的句子，人家就看不懂。“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人家也看不懂。

有复杂的句法，如乔木的；有中国句法，如主席的。

语言总是要提炼。

要下功夫背文章。白话文难背，但也得背些句子。

标点符号也要注意，它本身就有抑扬顿挫。引号前是冒号的，最后一个句点放在引号内。是逗号的，就要放在引号外。

句子还要讲究声韵。中国文字是由单音词至双音词、至多音词在发展的。现在多数是双音词。多音词是外来语。由单音至多音是个发展规律。有些单音词。现在只起字母的作用。如“道”，单写这一个就不知道指的是什么。有的文章，意思对，语法也通，但就是念起来不好听。句子的后面，把单音词改为双音词，就好听些。如“警察检查船(只)，防被偷盗银(钱)”。文章写出来以后，最好念一念，看顺不顺口。

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现象只是入门的向导，进去以后就丢开了。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

文章长，一是舍不得丢材料，材料堆砌太多；一是舍不得丢观点，观点摆得太多。这一点，要学八股文——承题，起股，束股。八股文是讲究逻辑的。陈恭禄《殷有三仁焉》一文有代表性(中华书局版)。破题又讲起讲，笼罩全篇。我们的文章，开头往往交代不清，人家不知道你要写什么。

写文章如导游苏州园林。在一个范围内，使人家跟你走，但又不浪费脚步，一程一程引人入胜，又不迷惑。如《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选)，要是我们写，几句话就说完了。但主席由近而远，从各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使人印象深刻。

根本的是抓到问题的中心展开。如《六十条》，可抓分权。总观点抓到，小观点有取舍。

好的文章像一柄伞，有一中心，撑开收起。

方法问题，千差万别。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总观点可以先写，也可以最后点题。无论如何，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把问题讲清楚，而且令人印象深刻。总观点放在开头的，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选)。放在后头的，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这篇讲话，先讲晋绥的工作，后讲总路线，说明毛病出在对总路线认识得不明确。

最困难的是抓最主要的东西。

抓住最主要的东西，抓住矛盾的各个侧面，正说，反证，层层分析，加深印象，阐明道理，文章就有了曲折、起伏。

标题是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有时，一篇文章并无突出的观点。可用标题把它统一起来，如《学习和时局》(毛选)，这一标题就统一了全篇的观点。否则文章就显得很散。契诃夫说“标题是最困难的”。标题好比帽子。

主席的文章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我们的有些文章，往往是奉命宣传。

“斗争出理论”(主席在武汉会议上说的)。文章要有对立面。马克思、列宁都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反对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流派。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比较容易识别。

准确，鲜明，生动。

准确与生动往往是矛盾的。如“坐在神坛上的有一千只手的拿着……的菩萨”，准确是准确，但不生动。外延愈多，内涵愈少(逻辑学)。如“圆的漆着红漆的雕花桌子”，也是如此。准确性，往往是外延多。《资本论》的句子就是如此。

准确性，一是指用词准确，一是指说明这事物的性质。总的先交代清楚，后来就用这个词，如“党八股”、“持久战”，字虽然少，但人们一看就明白。

准确性就是说清楚。但说清楚又往往不生动。处理好了，二者统一了，也就鲜明了。否则也就不鲜明。

逻辑科学还要读读。

主席讲的这三性，可以做为奋斗方向。既从内容方面说，又从表达方法来说。

既不要对读者要求过高，以为该交代清楚的不交代也可以。又不要对读者估计过低，以为读者什么都不知道，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交代的也去解释、交代。写文章要看对象，要了解对象。

博精关系。先博后精较好。基础大，路子宽，砌得高。如砌宝塔。

记忆力问题。记东西要成体系。成了体系，遇到新东西就各得其所。如记历代学者，先有派系轮廓，然后区分某人为某学派，有了新知道的就插进去，这样就容易记住。好比中药铺的药柜有许多抽屉一样。

记忆力一为理解，指深度；一为掌握联系，指一个事物的上下左右或前后的联系、体系等。

(责任编辑：方 徨)

(作者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高级记者)

《北风吹》饮誉世界 曲作者埋名 52 年

● 前 民

中国歌剧选曲，能在我国听众中妇孺皆知，并能在外国人的心目中产生影响、留下印象，实属难能可贵。歌剧《白毛女》选曲“北风吹”就是这样一支歌曲。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登上景山，到最高处万春亭内，见一日本老年妇女，她和一些晨练的中国老年妇女一样，将腿举到了亭中间的石台上。我问她：“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我年轻时，是游泳运动员，现在是教孩子们游泳。”我说：“我也是个冬泳爱好者。”她听我这个普通老头儿说能在冰里游泳，感到惊奇，忙问：“您是做什么的？”我说：“您知道中国的《白毛女》吗？”她和身边的一位少女都摇头。我说：“您知道《北风吹》吗？”这两位日本妇女立即连连点头喜形于色，忙说：“知道！知道！”并顺口唱了起来。接着我们又用她们国家的语言，一起唱了一遍。唱完歌曲，我们的关系拉近了。我问她：“怎么就会唱《北风吹》？”老年妇女指着身边的少女说：“她是我的女儿，我在北海道札幌市工作，她在东京当律师，她的爱人即将到中国来参加一个叫易水会的会议，我们一家人都主张和中国友好，我们都在学习汉语，日本有一家最大的广播电台，叫 NHK 电台，每当它广播汉语讲座时，开始曲就是《北风吹》。因此在日本从北海道到南方的九州和冲绳，凡是学习汉语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北风吹》的，这首歌很美、很好听，内容也和日本的风俗习惯很相似，因此我们都爱唱。”临别时，母女俩都将双手放在膝下深深地鞠了一躬，连说：“再见！再见！我们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旅游一次，今天是我们在中国度过的最愉快的一天。”说话间许多游客都围

了上来，看着母女俩的背影，他们问我：“你们早就认识？”我说：“不！是刚认识的。”这次如他乡遇故知般的会见，其中如说有什么文化交流的话，它的纽带就是《北风吹》。

归来后，我又翻看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先生的大作，他在《松山芭蕾舞〈白毛女〉》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日中邦交即将恢复之际，我乘小型飞机由北京飞往上海，当时在机内传来了《白毛女》中《北风吹》的歌声：‘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听到这首歌曲，我流泪不止，与我同行的唐家璇先生看到我，感到不知所措。”

我参加歌剧《白毛女》的演出，已整整 50 年了，但从未听说过哪位观众，听完这首曲子就流泪不止的，因为在歌剧中，悲剧情节的发展还在后面，是什么使这位日本友人如此激动呢？诚然理由是多方面的，如在中日未建交之前，他们已经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扮演喜儿的又是他的夫人松山树子女士，她的演出曾多次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欢迎，此后又由松山树子传给了他们的儿媳日本著名舞蹈家森下洋子。他们已将《北风吹》改编成著名的《北风舞》了，这是他们的心血结晶，因此当《北风吹》的旋律起时，清水正夫先生的流泪不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打倒“四人帮”后，1977 年 5 月王昆随天津歌舞团访日，6 月 17 日在松山芭蕾舞学校内联欢，她和已五十多岁的松山树子先生，又合作了一次“北风吹，雪花飘”。在场的两国朋友都很激动，当晚她就写诗一首，她说：“树子起舞我为之伴唱。触景感时，思念总理，因之得句：

五五北京初识君，总理牵手且叮咛。

两个喜儿传佳话,异国姐妹同台人。

七七东京杜鹃红,鬓丝几缕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犹闻总理击节声。

(注一:“五五”“七七”为1955年和1977年)。

(注二:“雪花”为“北风吹,雪花飘”一段的舞蹈,即清水正夫先生在书中写的《北风舞》)

《北风吹》不仅饮誉日本,早在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歌剧《白毛女》就演遍了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并唱到了音乐之乡奥地利的维也纳。上海芭蕾舞团已将《白毛女》演遍了五大洲,演出已超过1400场,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在国内就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那么,《北风吹》的作曲者究竟是谁呢?50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根据河北民歌《小白菜》改编的集体创作。

直到前年夏我受张鲁老师的邀请,有幸和王昆、孟于、吴雁泽、于淑珍、远征、卢秀梅、郭蓉等许多位著名歌唱家一起,赴石家庄参加《张鲁作品音乐会》演出时,一看说明书,方知《北风吹》原来是张鲁老师个人创作的。这件事给我的震动不小,因为《北风吹》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再则和张鲁老师相识50年,他从未提及这件事,我被张鲁老师不计个人得失的这种高贵品质深深地打动了。

张鲁老师在他的《〈白毛女〉的音乐创作及演出》一文中说:“第三天下午最后一次试唱后,张庚下令,明天一定要把《北风吹》完成,演员在等着排戏哩!我们每个作曲者也急得要命。这时已是第四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在5个人中间是唯一没有单身宿舍的学生,没有创作的环境与条件,无奈只好把本班同学孟于的房门敲开。在不到8平米的房间里,孟于抚养着刚生下近三个月的

小孩,尿盆、尿盆,再加上木炭火盆烤着‘尿褥子’,真是熏人。但那时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一心钻在《北风吹》的写作上。正在着急上火之时,突然想起贺敬之曾说过:‘喜儿最好用河北民歌《小白菜》做为她的基调。’这个回忆使我高兴地蹦跳起来,当孟于的孩子哇哇的哭起来,我才想起是借着人家的屋子搞创作呢!

“如果完全用旧曲填新词,这显然不能表达十七、八岁天真活泼、纯朴可爱的喜儿的性格,也不能表达她盼望爹爹及早返家的不安心情及内心的忧伤。喜儿多么盼望爹爹回来欢欢乐乐过个团圆年呀!这种极为尖锐矛盾的心理状态,用原曲无疑感到过于低沉忧郁;从节奏上讲用五拍子不适于喜儿的心情,如用两拍子又过于轻佻,所以改为三拍较为适当;在旋律上根据喜儿当时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感情予以发展变化使感情更为深化。

“改变发展后的《北风吹》,显然比旧曲更为饱满和吻合地表达了她盼爹爹又耽心爹爹的内疚感情。”

其实就是7个音符,经过张鲁老师艰辛的劳动,将它巧妙地排列起来,就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受到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欢迎。真是人生朝露艺术千秋,张鲁老师的名字,是当之无愧地应该载入史册的。

(责任编辑 致 中)



右起:于淑珍、前民、张鲁、孟于、孙彦惠

1998年10月2日北京已是深秋，乘车南下一游。以耳顺之年完少年时宿愿。

车行甚速，窗外沃野平川一派丰收在望景象。中秋佳节抵海宁盐官古镇。遥望占鳌塔飞耸江岸。登观潮台，只见钱塘江波光粼粼，秋水东去，江面浩瀚似无涯际，江中无一船，空中无一鸥，只有岸边千百人头攒动。

南方秋日烈焰熠熠，酷热难耐，汗流浹背，只得躲在树荫下。江风徐徐，方有一丝凉意。十一时许，隐隐听得隆隆声，似马达轰轰，似雷声殷殷。东望天边水天一色，隐约似有一线白色“云带”，横亘南北，绵延天际。既而隆隆声渐增，白色“云带”渐宽，终于幻化为滚滚波涛汹涌澎湃。潮头一字排开齐头奋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万马奔腾之势逆流而上。有如蛟龙出水、怪兽恣肆，浪花飞溅有如卷起千堆雪。转瞬之间潮头已达台前，江水暴涨浊流翻滚，风驰电掣倏尔远逝。江面重又恢复了平静。

钱塘潮为天下奇观，皆因自然造化之功，天时地利之故。杭州湾呈漏斗形，东临沧海，海阔天空，西为斗底，江水入湾。每当朝夕潮水涌入湾内，因地势渐窄水行愈速愈高。当行至江水入湾处，江海二水相搏。海潮胜江水逆流而上所致。且一日“三潮”，潮潮各异，环球无二。海潮与江水初会于丁桥成“交叉潮”。而后挟势上行至盐官一带成“一字潮”。继续上行在老盐仓处斗柄南折，潮头遇阻，惊涛拍岸浪高数十米，蔚为壮观而成回头潮。余波已为强弩之末，逐渐融于江水中，至杭州六和塔处消弥。每当中秋佳节时海内外人士纷至沓来，皆以一睹为快。

为何要在中秋节观潮？后游海神庙，请教导游周先生。据周先生谈：一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8月18观潮，而后文人墨客未敢脱离窠臼。二是海神节为8月17日，因此世人皆知8月18观潮。实则每天均有潮汐，

盐官古镇纪游

● 包绍华

每逢朔望各5日为大潮，其余时日均为小潮而已。据水文资料记载，每逢台风暴雨才会出现最大潮。

游陈阁老宅

离观潮台进古镇，路经王国维故居、唐安国寺遗址抵陈阁老宅。曾读金庸先生著《书剑恩仇录》一书，思查“春晖”一匾，再探乾隆六下江南三访陈宅的奥秘。

陈阁老宅座南朝北，高墙、大门、石阶、石槛，确有清代大宅风范。入室恰遇两位胸配导游证的女学生，向其探询，学生反问：“您从哪里来？”答曰：“北京。”学生甚喜，愿为导游，引我入一室，见碑刻数十帧，导游讲道：“这是本宅三宝之一的碑刻，这一块是晋代魏夫人碑。”我笑问：“你可知魏夫人何许人也？”导游茫然面露疑色。魏夫人名魏华存，晋武帝司徒魏舒之女。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百家，精通儒学，尤好老庄。后被尊奉为道教上清派鼻祖。据传魏夫人始授黄庭经，自此黄庭经为道教必修的经典。室内碑刻多为历代名家真迹。

循迴廊入另室见“诰命夫人”匾，为乾隆御笔赐封。可见乾隆对陈氏家族恩宠有嘉。匾已褪色用玻璃罩封存完好，未加修饰因而保留了古韵，更显示出艺术历史的气息。

进入花园有金桂飘香，令人发怀古之幽思。院内栽有香橼等多种花木。室侧一罗汉松胸径尺余，干披绿

苔，古拙遒劲；导游讲：“曾有植物学家估计树龄约为三百余年，为本宅第三宝。”从院墙镂空的窗口西望邻院，颓垣断壁杂草丛生，令人唏嘘。转入大厅见原陈阁老宅模型，现存仅为旧宅三分之一，可见当年盛况。

民间盛传海宁陈阁老为乾隆之父。依据之一为乾隆六下江南三访陈阁老宅，非同一般。其二为乾隆御笔“春晖”一匾，取自唐代诗人孟郊《游子吟》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后世人均以“春晖”为母爱。金庸先生系海宁人，依此说演绎成书，更使人深信不疑。

查史访宅，陈氏家族自清初以降数代为进士、阁老等，均为朝廷重臣要员，与清帝关系甚密。盐官古镇为运河槽运重地，设盐税官衙，现仍有盐官遗址。陈氏大宅于当地更无其右，迎请圣驾乾隆下榻也理所当然之事。于居住条件、安全均可谓上选。而“春晖”一匾乃陈阁老后代呈请乾隆御笔“春晖”以示忠孝之意。查康熙圣祖倡导儒家孝道，并以此抑制复明志士，而定为国策。身为康熙之爱孙的乾隆深谙此中三昧。受爱臣之请御书“春晖”一匾以赐陈家，于情、于理、于政、于民均有百利，何乐而不为之。

胡适先生研究历史曾发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慨叹。民间传说是美丽的、更是富于幻想的，但乾隆为陈阁老之子并非真实。

(责任编辑：致中)

清官梦

● 靳树鹏

中国的老百姓，从古至今并没有很强烈的参政意识，倒是很盼望清官，一直做着清官梦。

宋朝有个包拯，明朝有个海瑞，都是大大的清官，至今在银屏和舞台上还经常出现他们的形象，然而无论是宋朝还是明朝，还不是赃官遍地么？我们有过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也有孔繁森这样的地委书记，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相反的现象，中纪委向十五大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党的十四大以来，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000多件，结案670100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9300多人，其中开除党籍121500多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处分的37492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0295人，厅（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可见，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榜样的力量有时是极有限的。

文人百姓传唱清官，政党政府表彰清官，然而从古至今，贪官并未见减少。这对清官梦是一个不小的调侃。

当官为宰者都握有程度不同的权柄，官和钱也就结下了姻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古时的某种写照。近代，无论是军阀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也有“当个团长黄金万两”之类的说法。可知“权钱勾结”并非自今日始，只是由于社会的进化名堂更多罢了。

巴黎公社的原则之一是执政者做“人民公仆”。公社的原则都闪耀着理想的光辉，但历史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阶段，这些原则还不能成为现实，“人民公仆”一词也就成了宣传口号。据我粗略的观察，中国的清官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道德力量。天下本无圣人，凡人都有卑下的欲念，以

自身的道德操守遏制卑下的欲念，才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为官是清官。但在芸芸众生、衮衮诸公中，道德高尚者毕竟有限。

难道官吏腐败成了人类社会之癌，无药可医了吗？也并非如此，只是比较难治就是了。社会政治制度从专制制度迈进到民主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伴随着的就有清官增多，贪官减少。民主政治也并非是“人民当家做主”，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只是希腊城邦中的个例，在后来广土众民的国度里都无法实现，所能实现的只是近代民主制度。“人民当家做主”同“人民公仆”一样，也成了宣传口号。有不少政治家和哲人论述过近代民主制的内容，这就是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及允许存在反对党等等。我想，政治民主的社会中，意识形态也应该是多元的。多几双监督的眼睛总比少几双好，有点不同的声音总比没有好。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是一双监督的眼睛，就是一个窗口，被人们称为“焦青天”。可真能起到监督作用的窗口似还嫌少些。罗素说：“在一个社会中，那里统治者如果一有罪行，便能为大众所知的话，那么那里的政治家们的行为也会比较好些；在受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控制的社会中，统治者们的行为便会差些。”有些

国家，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都能以受贿贪污等罪被传讯到法庭，记者可以拍照报道，这没有什么不好。

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曾经写道：“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今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这些话非常精辟也十分沉重。腐败是个顽症，哲学家的高论固然不能奏效，政治家发号施令有时无济于事。表彰一批廉洁奉公的好官清官很有必要，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众人也会称快，但从根本不算干部的村干部到绝对算干部的高级干部，腐败奢糜之风似还在蔓延滋生。有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这是哲学上的外因论，不能说服人。治病治本，浇树浇根。腐败现象形成某种气候，除了腐败者自身的原因外，我们这个社会在体制上、机制上、法律上等等，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需要改善的地方呢？答案是肯定的，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似乎最为紧要。

（责任编辑：刘家驹）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

● 何蜀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井泉就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有股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当时挂靠在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

“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烈火”点燃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特别是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大批“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国庆游行队伍。然而，谁也不会料到“文化大革命”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所谓右倾的“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来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跑到上海去抓他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回到四川后，他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采取主动，向群众作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当时成都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联系，商定共同召开一个批判大会，好让李井泉等领导干部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以便过好这一关。

1966年11月13日，以“红卫兵成都部队”领衔的几个群众组织主持，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25万人的

批判西南局、四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李井泉与红卫兵双方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仍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由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

这一新“动向”传到红卫兵耳中，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的阴谋。于是，发起了向大会造反的行动。他们打着各自的旗帜，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散发造反声明，强行冲击主席台。这一来，会场秩序大乱。混乱之中，为了保护李井泉的人身安全，一些红卫兵纠察人员将他护送离开了会场。事后不久，却又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了。

李井泉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在陶铸被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了上海。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30余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他们原想大会结束就将李

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李井泉竟失踪了。

“挺进纵队”遍寻成都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1967年新年,“挺进纵队”获得李井泉在上海养病的消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智取的“战斗方案”。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

因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途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获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战斗小组”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

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派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没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他不是开什么开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李井泉应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满城的造反喧嚷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墙的标志、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

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战友”,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路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自然只能作出一种回答。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做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要花招”而拒绝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然后,“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中共中央档案历险记

● 王光远



陈为人

瞿秋白制定 《文件处置办法》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明确规定，中央的文件要由一名中央领导人亲自保管。1923年设立了秘书，改由秘书保管，毛泽东就曾任过秘书。1926年中共中央设立了秘书处，下面设有文件保管处。根据中央的指示，

这个文件保管处同时也是中央各机关的文件存放库。后来党内的一些同志都称它是“中央文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和各地各组织之间的文件来往越来越频繁，积存在中央的文件也越来越多。为了保管好这些文件，在中央秘书处下面设立了文件阅览处（供中央负责人阅读文件的地方），负责人是张纪恩、张越霞夫妇。

1929年，周恩来指示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

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件档案，以便于保存和查阅。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又同张纪恩商议，订一个文件整理和保管办法，并请阿秋（指瞿秋白）先起草一个文件处置办法。这时，瞿秋白已不再担任领导工作，他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处置办法》，这是我们知

道的中共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规定。

《文件处置办法》共有七条，对于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以至如何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周详的规定。

《办法》特别注明：全部文件、档案、资料，“均按时日编”，各省区材料“时日以中央收到的时日为标准，按次编排”。

《办法》对哪些文件、资料需全力搜集、保存的，哪些可以销毁的，都做了具体规定。

尤为珍贵的是，瞿秋白在《办法》的末尾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的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其中的“将来”两字旁边打上了着重圈点。

陈为人为保卫 中央档案而献身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五四”运动时期，和蒋先云、夏明翰等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入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并被第一批送往苏联学习，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北方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又任过满洲省委书记等职。党派这样的高级干部来主持中央文库的工作，可见党对这一工作的重视。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他们一般都不参加党的会议，也很少参加其他的社会活动。他们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白天穿上漂亮的衣服，以生意人的面目出现，晚上经常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把厚纸的文件抄在薄纸上，还得抄成小字，有时还要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纸边，尽量缩小文件的体积，按时间、地区、问题加以分类整理，然后装箱，便于保管和转移。

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同外面任何人发生关系，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陈的妻子）和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单线联系。搬家转移文件是最担风险的事，每转移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在房间里安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将整理过的文件碎片，随手烧掉。陈为人还和韩慧英商定，一旦出了问题，又无法挽救时，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也绝不让敌人得到党的机密。有一段时间情况相当紧张，他们就把文件搬到霞飞路一个白俄人家的楼上，因为敌人想不到白俄人家中会藏有共产党的文件。

1935年2月，敌人在一个晚上破坏了我们8个活动据点，张唯一也被捕了。韩慧英去送文件时，也被等候在那里的

特务逮捕了。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立即用每月三十元的高价，在小沙渡合兴坊15号租了一幢二层小楼，将中央文库转移至此。这时，他和党组织断了联系，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他既要担负保管文件的重任，又要抚养和照顾三个孩子。不得已，他把在河北省正定教小学的妻妹韩慧如找来帮忙。

韩慧如回忆说：“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日子。一到他家，只见姐姐被捕后留下的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最小的女孩那时已经一岁多，还睡在摇篮里。我担起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但是日子越来越困难，为人断了经费来源，我带到上海的钱也都用光了。……为了要凑钱按时交付房租，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以后不仅是家具，连能卖的衣服都卖了，小女儿冬天的裤子，我是用包文件的包袱拼凑做成……最困难时，一天只好吃两顿山芋。为人总是天黑时出门，到曹家渡买担山芋，坐着独轮车回来，堆在亭子间里。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饥饿难熬。我怕小女孩经常啼哭遭致祸害，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的习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大孩子没吃饱，说：‘我还要吃’，为人说：‘别吃了，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就说：‘好，我们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想逗孩子乐起来。看着他带着孩子跳舞，苦中作乐，我心疼得

止不住流泪。”

1935年底，韩慧英获释出狱，后又进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韩慧英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才和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接上了关系。徐强回忆说：“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他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地址，他都不敢讲。后来经过深入的谈话，他才解除顾虑，把我带到他家中。”

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另一同志负责，送他去医院治疗，又派纪纲和一个叫老金的同志与韩慧英联系，纪纲是位中医，还可给陈为人治病。这时，陈为人已到肺病晚期，终于在1937年3月12日病逝。灵柩暂厝在湖南会馆，后毁于日寇进攻上海时的战火。

保卫档案 “自有后来人”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开始由徐强负责，徐强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1928年参加领导过浙江武义县的秋收暴动，后到上海工作。1930年任松江、清浦两县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调到中央特科。徐强接受任务后，就把文件由陈为人住所搬到凯自尔路（现金陵中路）周天宝的一个亲戚家中。1939年春，徐强调往延安，中央文库交李云负责。不久，李云也调往延安，文库交由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负责，他指定由刘钊

此，吴成方和陈此生将一些文件装在两个航空皮箱里，交给刘少文。后因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区也要作战略转移，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陈此生的领导人陈惠瑛，将他保管文库的情况，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作了汇报。9月14日，陈此生雇了一辆胶皮车，和爱人王月英一起，步行几十里，将文件送到市委组织部。10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特公开发表嘉奖信，表扬陈此生安全保管中央文件的事迹，并对其家属表示感谢。

这批文件共有16箱104包。包括了从党的成立到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时为止的许多重要文书档案。主要有：1. 党中央各种（届）会议记录、决议案；2. 党中央给各地（级）的指示及各地给中央的报告；3. 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4. 中央及各地（级）在党务、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兵运、妇运等方面的文件和档案；5. 党报、党刊，如《红旗》、《实话》、《布尔什维克》、《斗争》、《党的生活》、《党的建设》、《捷报》、《中央政治通讯》等等；6. 苏区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7. 共青团中央及各地（级）文件；8. 互济会文件和档案；9. 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瞿秋白等先烈的遗墨、遗嘱、遗像等。这批中央的珍贵文件，成为编写党史、军史的第一手材料，现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责任编辑 刘文）

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

和缪尚清二人保管。后刘钊调走，文库搬到康定路生生里的一个三层阁楼上，由缪尚清负责。缪尚清又名缪国生、李念慈，是一位长期坚持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的老同志，曾协助恽逸群办《立报》，当时他正患肺病，他一面养病，一面负责文件保管工作，备尝艰辛。

1942年夏，缪尚清病重，改由吴成方负责，吴成方也是一名老党员，曾负责过北平市委和华北政治保卫局的工作，1933年调到中央特科，负责警卫部的工作。吴成方把具体管文件的任务安排给了陈此生。

陈此生是一个失业的铁路工人的儿子，住在上海闸北的贫民窟，本人曾在一家外国饭店当学徒。“八一三”后家园被毁，他逃进租界，被收容在赵朴初等人筹办的难民所里。地下党员周新民、邱凌就在难民所中进行活动，邱凌是陈此生所在的“慈愿难民所”的管理员，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陈此生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去苏北参加过游击队，后又调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陈此生接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后，为了保卫文库的安全，他又叫弟弟在弄堂口摆了个摊子做掩护。这里行人稠密，不太安全，他又改租了成都北路974号的房子，开了个“向阳号”切面店，在屋里搭了个阁楼，将文库藏在阁楼的夹壁墙中。后因陈此生的领导人吴成方被捕，他将文库一度转移到新闻路488号兴隆大饼店的灶披间。陈此生也曾被捕过，因查不出证据，经花钱买通后，很快就释放了。据刘人寿回忆：1943年延安整风时，需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陈此生组织人连夜抄写出来，由刘人寿拍摄成照片，将底片装在干电池里，由华中局交通员何萃亲自送往延安。

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到了上海，党中央曾打算将中央文件运回延安，办法是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负责运到南京，然后用专机空运延安。为

炎黄春秋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悲怆的人生 ■

也谈不可淡忘「文革」 ■

陈永贵过「关」记 ■

新官堕落定律 ■

杨勇上将当红娘 ■



李锐和高岗护送胡耀邦骨灰去江西



1985年,丁一岚再上天安门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